

分类号 F239/309
U D C 675

密级 公开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研究
——以北京文化公司为例

研究生姓名: 张新瑜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张金辉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审计硕士

研究方向: 社会审计

提交日期: 2024年6月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马长新 签字日期： 2024.6.1

导师签名： 张金峰 签字日期： 2024.5.31

导师(校外)签名： 唐斗 签字日期： 2024.5.30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 / “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马长新 签字日期： 2024.6.1

导师签名： 张金峰 签字日期： 2024.5.31

导师(校外)签名： 唐斗 签字日期： 2024.5.30

**Research on Audit Risk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ies under 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Agreement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ulture Co.**

Candidate : Zhang Xinyu

Supervisor: Zhang Jinhui

摘 要

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影视企业并购活动日益频繁。签署并购对赌协议作为并购业务中常用的投资风险管理手段，旨在通过业绩承诺降低收购方的投资风险。然而不少影视企业为完成对赌协议中的业绩承诺而利用并购过程进行资本运作与财务造假，严重损害了投资者权益破坏了资本市场良性发展。这些围绕着对赌协议展开的违规运作为审计工作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本研究以北京文化公司为案例，聚焦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并购的审计风险，提出风险控制建议完善审计流程策略。

研究从宏观层面入手，分析影视行业特性，探究影视企业在扩张期并购过程中签署对赌协议的动机。围绕着行业的经营困境与风险，探讨对赌协议本身如何催化风险形成，总结签署对赌协议的企业存在的审计风险特征与形成机制。在微观层面，研究选取北京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造假案进行梳理研究，回顾北京文化在业绩对赌协议期间进行的，虚增收入和商誉、发布虚假信息及资本减持套利等行为。结合信号传递理论与舞弊三角理论，对该案例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还原。依托审计风险模型，从报表层面、认定层面及审计检查层面，对北京文化公司的审计风险形成机制及特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针对性应对措施，旨在降低此类审计风险，保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基于理论分析及案例研究，本文认为面对影视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签署并购对赌协议的情况时，被收购方为了完成对收购方的业绩承诺，可能存在粉饰商誉、虚增业绩等舞弊行为，收购方为维持股价同样存在包庇被收购方财务舞弊行为动机。面对此类业务时，注册会计师需从行业特性、对赌协议内容、融资及收入来源、股价与绩优财报的背离程度以及营收与业绩承诺的拟合程度几大方面识别潜在风险。同时需关注资产存在的完整性以及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从多方面提高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影视企业 对赌协议 审计风险 风险控制 北京文化

Abstract

In the rapidly evolving cultural industry,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y M&As have increased, using VAM agreements to mitigate acquirer investment risks via performance promises. Yet, many such companies resort to performance fraud to meet these commitments, employing M&A for capital maneuvers and harming investor rights and market health. This scenario introduces new audit risk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case study of Beijing Culture Co., Ltd.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and F&T Entertainment industr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ntent and motivation behind signing VAM agreements during expansionary M&A period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and audit risks in the Media and F&T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audit risks in companies signing VAM agreements. Surrounding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companies, it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s behind signing VAM agreements and how the agreements themselves catalyze risk formation.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performance fraud by Beijing Culture Co., Ltd. is specifically analyzed, reviewing its behavior of inflating income and goodwill, and disclosing fals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VAM agreement period. The study integrates modern , signaling theory, and the fraud triangle theory to analyze the case's fraud process. Based on the audit risk model, it analyzes Beijing Culture's

audit risks from the levels of significant misstatement risk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recognition level, and inspection risk, reveal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udit risk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ies under VAM agreement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Media and F&T Entertainment industry signing M&A VAM agreements, the acquired party may engage in fraudulent behaviors such as beautifying goodwill and inflating performance to fulfill commitments to the acquirer, while the acquirer may also have motives to conceal the financial fraud of the acquired party to maintain stock prices. When dealing with such business,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should identify potential risks from aspects such a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VAM agreement details, financing and income sources, the divergence between stock prices and excellent financial reports, and the fit between revenue and performance commitments. Attention should also be paid to the integrity of asset existence and the risk of receivable collec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udit work from multiple aspects.

Keywords: Film and Television Companies ; Contingent Consideration Agreements; Audit Risks; Risk Management,; Beijing Culture

目 录

1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的背景	1
1.1.2 研究的意义	3
1.2 文献综述	3
1.2.1 审计风险相关文献	4
1.2.2 影视行业审计相关文献	4
1.2.3 对赌协议相关文献	6
1.2.4 文献评述	7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1
1.3.1 研究方法	13
1.3.2 研究内容及框架	13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6
2.1 相关概念界定	16
2.1.1 并购对赌协议	16
2.1.2 审计风险	16
2.2 理论基础	17
2.2.1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18
2.2.2 舞弊三角理论	18
2.2.3 信号传递理论	20
3 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形成机制及特性	20
3.1 影视行业审计风险	21
3.1.1 影视行业业务范围	21
3.1.2 影视行业相关特性	21
3.1.3 行业固有审计风险	23
3.2 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的审计风险	27

3.2.1 审计风险形成机制	27
3.2.2 审计特性	28
4 北京文化公司审计风险案例研究	31
4.1 案例介绍	31
4.1.1 案例选取依据	31
4.1.2 收购方北京文化影视有限公司	31
4.1.3 被收购方概况	31
4.2 案例事件梳理	35
4.2.1 案例事件发生	35
4.2.2 对赌协议设计及履行情况	39
4.2.3 事件经过	41
4.2.4 处罚结果	43
4.2.5 审计经过	44
4.3 审计风险分析	46
4.3.1 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47
4.3.2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47
4.3.3 检查风险	48
5 对赌协议下影视行业审计风险应对	52
5.1 重大错报风险识别与评估	52
5.1.1 识别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52
5.1.2 识别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52
5.2 防范检查风险	53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59
6.1 研究结论	59
6.2 研究展望	59
参考文献	61
后记	61

图表指引

图 1.1: 2013-2023 年中国影视行业市场规模.....	01
图 1.2: 研究框架图.....	15
表 3.1: 2023 年 A 股市值前八位影视企业第三季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23
图 3.1: 对赌协议下审计风险形成机制.....	28
图 4.1: 世纪伙伴股权结构.....	32
表 4.1: 世纪伙伴基本财务状况.....	34
图 4.2: 浙江星河股权结构.....	36
表 4.2: 浙江星河基本财务状况.....	37
表 4.3: 北京文化收购时间线.....	38
表 4.5: 北京文化收购交易对价.....	40
表 4.6: 主要负责人处罚情况.....	44
表 4.7: 北京文化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	46

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确认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报告¹，2023年全球文化传媒市场(E&M)收入达到2.32万亿美元，中国文化传媒行业的总收入约3586亿美元占全球15.4%，但出口额仅1448.1亿美元，中国作为GDP占全世界总GDP18.5%的大国，其文化传媒市场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影视行业作为文化输出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经济建设中具备重要地位。

影视行业涉及影视作品的创作和制作、作品的市场营销、版权管理、国际发行等多个方面，其业务模式和收益结构复杂多样。自2015年，随着政策层面的协助、与金融投资市场扩容以及产业链的现代化和商业模式的改进，影视行业加速扩张。其市场规模于2023年达到3188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达到15.51%。相关企业通过融资并购，整合上下游产业，扩张业务规模。中国影视市场规模增长与变动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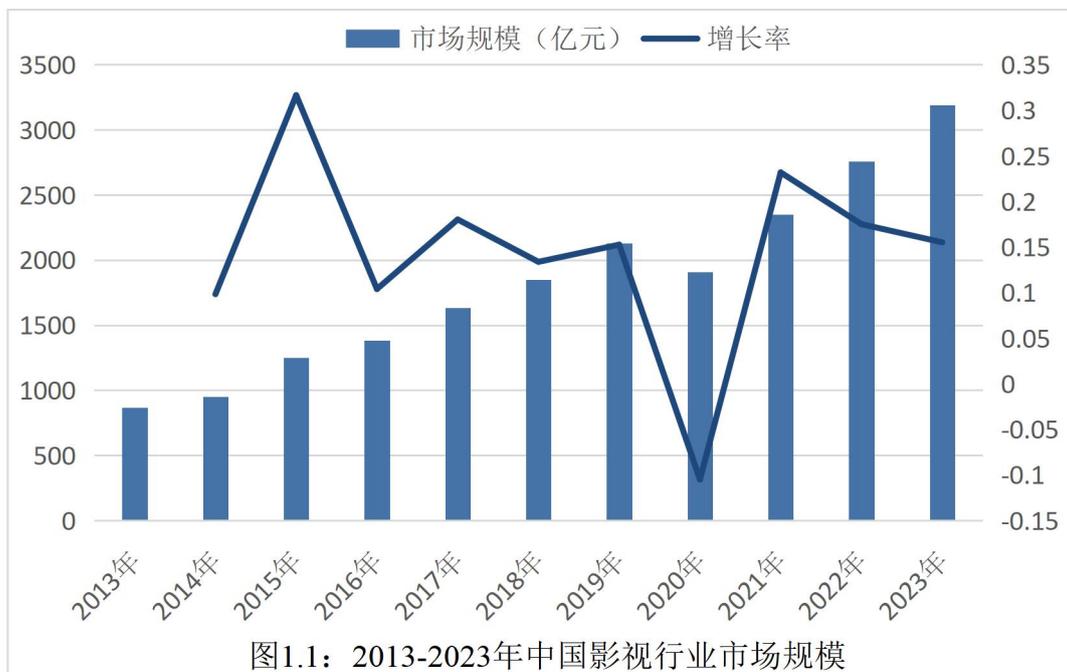


图1.1：2013-2023年中国影视行业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统计口径：中国电影市场和连续剧市场

¹ Perspectives from the Global Entertainment & Media Outlook 2023 – 2027.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如图表显示，除去 2019 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规模降低，自 2013 年至 2023 年中国影视行业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从 866 亿元增长至如今 3188 亿元几近四倍。在 2019 至 2022 年疫情期间，该行业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7.9%，甚至在 2021 年后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速增长。预计到 2024 年，中国影视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3618 亿元人民币。

但随市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影视行业相关违规问题逐渐显现，如艺人逃税、企业管理层腐败及业绩粉饰等。影视行业本身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其出品方创作前期需投入的大量资金制作影视产品。出品方无论是出售影视版权给发行方还是参与院线分成，其回款周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而下游参与影片放映的院线也存在较高经营风险，促使影视企业意图通过兼并垄断市场降低经营风险。而在兼并期的影视企业无论是对被收购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估值，还是在完成并购后商誉的计提，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商誉的计量涉及对收购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不仅依赖于对行业趋势的判断，还需要考虑具体的运营策略和管理能力。这些因素都使得估值和商誉计提充满挑战，其较大的主观判断和估计误差也为业绩舞弊提供温床。

在并购扩张期间，很多企业采用业绩承诺的形式，如通过签署对赌协议，既降低了并购方的投资风险，也使被并购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融资继续运营。但是，这一机制也为企业经营增加了经营压力与舞弊动机。部分企业通过虚增收入挪用子公司资金等方式粉饰财务报表以完成对赌协议，在股价高位减持套现，利用资本手段进行贪污腐败。这些行为增加了审计风险与监管困难，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竞争。从 2019 年唐德影视大幅修正其利润，到 2020 年欢瑞世纪因会计错误调整利润，再到本文研究的北京文化财务造假案例的乱象可见，影视行业是财务舞弊的高发区。因此，加强该行业相关业务的审计风险控制变得十分迫切。

为了帮助审计方更好地在影视传媒企业存在业绩承诺时进行审计风险评估与识别，本研究以北京文化为案例，探讨了业绩承诺下影视企业的审计风险，目的是为行业特定业务节点上提供参考，提升对风险重要性的认知。通过研究解决以下问题：

- (1) 识别和评估并购对赌协议下影视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审计风险。
- (2) 总结类似业务可能导致审计失败的因素。
- (3) 提供有效风险管理策略降低审计风险。

1.1.2 研究的意义

理论意义：

(1) 拓宽现代审计风险理论适用性：通过对影视行业审计风险的深入分析，依托行业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分析其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结合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风险影响，设置必要的审计程序控制检查风险进而减低审计风险。调整审计程序的性质、时机和范围，以及对审计证据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依托审计风险模型完善类似业务情况下的审计程序。通过结合行业特定因素和风险动态来增强对审计风险的理论理解，拓宽审计风险模型在不同行业的适用性。

(2) 探讨舞弊三角理论因素之间的联系：通过揭示影视企业在并购时，这一特殊行业在特殊经济业务活动中存在的舞弊动机、机会和压力等因素。通过对三因素之间如何互相作用导致舞弊发生进行论述，深化理解舞弊三角理论。

(3) 突出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管理层对企业未来表现的信心和承诺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决策。以及同一经济活动中相关信息披露在不同参与者的角度存在解读误差，由于案例中股东存在高位减持套利，其股价与绩优的财务报表背道而驰，不同信息的使用者面对同一信息的处理也会影响投资决策。通过本研究可知信号传递理论不止可以应用于审计工作，还可适用于股票市场投资等领域。

通过这些理论的实证检验和拓展，研究不仅加深了学术界对于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和财务舞弊机制的理解，同时也为审计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帮助审计师和企业管理者更有效地识别、预防和应对潜在风险。

现实意义：

在企业的并购和合作中，对赌协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在充满挑战的影视行业里，它不只是一个资源整合和成本降低的工具，更是一个分散风险和增强市场垄断地位的策略。然而，尽管对赌协议在企业并购中的广泛使用，对于其在影视行业的特定应用及带来的审计挑战，目前的研究仍显不足。

本项研究致力于探讨对赌协议对影视企业经营及财务报告的影响，试图补充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对赌协议的应用场景远不止并购，它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重组和增发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随着一些企业利用对赌协议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逐渐增多，这不仅扭曲了市场规则，还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并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在影视行业，由于其独有的商业模式，财务舞弊的隐蔽性更强、成本更低，使得相对于其他行业，影视行业在财务舞弊方面的风险更为突出。

(1) 对企业的启示：通过对赌协议引发的财务造假案例，提醒企业意识到遵守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强化企业内外部的管理和监控机制，预防未来的财务舞弊行为，促使企业健康、合规地发展。

(2) 对审计单位的指导：本研究为审计单位提供了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的评估和识别方法，有助于审计单位提前识别和防范潜在的审计难题和风险，从而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3) 对行业的贡献：通过完善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工作的风险控制框架，本研究有助于规范影视这一特殊行业的财务与管理工作，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为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1.2 文献综述

1.2.1 审计风险相关文献

(1) 审计风险定义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布的在国际审计准则（ISAs）²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人员对实质上误报的财务资料可能提供不适当意见的风险”。《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中第十七条将审计风险定义为“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审计风险的概念在每一代学者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论证中的其不断完善。可查最早审计风险的词条诞生于 Norman 和 Philip（1957）的著作《Montgomery's auditing》。在审计工作及审计程序的设计过程中风险因素也将纳入考量，审计风险的研究由此诞生。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信息不对称和代理理论的发展，审计风险逐渐成为会计和审计领域的研究焦点。Kinney（1979）在其关于具体工作执行的研究中，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即便审计师执行了恰当且必需的审计程序，也可能未能识别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从而发表错误审计意见的风险。这里的错报主要包括两种情况：首先存在财务信息本身的错误归属审计单位；再者存在由于自身能力限制审计师未能未能发现这些错误的可能性。Haynes（1985）提出，审计风险包括因未能及时识别被审计单位的问题而导致审计师自身面临风险的可能性，这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Hirshleifer 和 Richardson（2006）进一步阐述，“审计人员可能对被审计实体的财务报表的公允性发表不适当意见的风险”被定义为审计风险，这一定义被广泛接受并流传。

²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Auditing (Ireland) 315 Updated October 2022

在国内关于审计风险定义的最早从损失可能论出发。在胡春元（1996）关于审计意见发布的研究中，审计风险的概念为审计师在发表无保留意见后未公允表达的财务报表重大错别引起的风险。王广明（2001）在其研究中对此进行补充认为审计风险应被视为注册会计师因提供审计意见而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张楚堂（2001）在研究中指出审计风险的定义为：“注册会计师未能准确对财务舞弊进行识别以及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存在可能。”

刘蓉（2016）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进一步细化了审计风险的定义，将其定义为在执行审计程序过程中，审计工作者在对发现信息化数据错误发觉中而未能及时检测的风险。在其后孙乃中（2017）中阐述了一个观点：审计风险与审计失败之间不为绝对相关存在一定概念差异：一个是已经发生且不可逆转的结果，反之审计风险是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审计失败直接关联到注册会计师，而审计风险则同时涉及企业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失败不仅带来负面结果，相反，审计风险的后果可能是双面的，既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存在正面的一面。

（2）审计风险模型

审计风险模型首次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提出，随着审计环境的演变，国际审计和鉴证准则委员会作为世界审计工作的主导，更新了关于审计风险模型的概念，关于审计风险模型就此成型，之后学界业界统一方针，为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的乘积组成审计风险。为了适应这一变化，Joseph 等（2009）强调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持续培训提升风险评估技能，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审计风险。Ana 等（2015）进一步指出，鉴于企业和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注册会计师应不断更新审计方法和技术，以适应这些变化。

在中国，周勤业等人（1993）首次引入审计风险模型，并对检查风险进行了详细细分。张萍和郎方方（2018）则强调研究审计风险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刘蓉（2016）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专注于信息系统层面的重大错报风险研究，而刘微芳（2018）则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发了审计评价模型，以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求。

此外，也有学者从会计师事务所的视角探讨审计风险。涂君（2016）从事务所的管理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陈蓉（2018）则深入分析了审计风险的成因，包括质量控制的不足和风险评估的错误或遗漏，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王生年等（2018）从审计师的个人角度出发，强调了行业专业知识对降低审计风险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审计风险的管理和控制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审计准则的更新、注册会计师的持续教育、审计技术的革新，以及从事务所和个人角度出发的多元化策略，以应

对不断变化的审计环境和挑战。

（3）审计风险形成的动因及因素

关于审计风险形成动因，Krishna（1997）认为相比于普通的业务，在面临审计失败诉讼的情况下审计师比以往对利润操纵行为更加注重，并可能通过提高审计谨慎性或选择辞职来避免法律诉讼。秦荣生（2005）研究指出，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成正相关紧密联系的是审计风险，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可由透明度公开程度解决。刘运国等（2006）通过研究表明，财务数据的真实性验证在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下会审计风险升高。王会金（2012）提出了影响审计风险的多种因素，并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审计风险控制框架，通过识别、评估和应对审计过程中的风险，结合有效的信息沟通、监督和持续改进机制，旨在提升审计质量和效率。

（4）审计风险应对

Muhammad（2011）提出讲公司治理列入新的考虑因素，有效减少重大财务错报的风险的根本是强调提高公司治理水平。Seidel（2014）认为只有通过准确的风险评估才可以有效防止审计失败，其程序应优先进行并严格实施，风险评估对于设定审计的重要性水平防范审计风险至关重要。Fuerherm（2015）从另一角度研究关于审计所受的影响因素，他认为审计费用会对实际结果产生影响，若审计收费过低，可能通过影响审计资源的投入，最终增加审计过程中的检查风险。韩维芳（2017）发现经验丰富的审计师更倾向于对高风险客户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显示了经验在应对审计风险中的重要性。郑登津和闫晓茗（2022）观察到，审计师会的采取往往发生于风险规避措施时，此措施的应用规避了更大的损失。

1.2.2 影视行业审计相关文献

在审计工作中行业专长被认为是降低审计风险和提高审计质量的关键因素，在影视传媒行业更凸显其重要性。Owhoso 等（2002）发现，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团队能在其专业领域内更有效地识别财务报告中的错误。影视行业企业的价值和盈利主要与其无形资产如专利、商标或著作权紧密相关，这些因素使得影视企业具有较高的无形资产占比，且影视企业具有明星效应，公司规模对高管薪资影响巨大。而 Particia（2014）强调，影视业应以合同为基础来确认收入，明确收入确认的时间和金额。Shaik（2015）认为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影视传媒行业特征明显，主要体现在其高比例的无形资产，如人力资源、版权、商标和专利等，这展现了其轻资产的属性。影视行业本身存在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在金字塔尖效应中脱颖而出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影视传媒严重依赖

于顶尖人才与资源，需要最杰出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电影工作者，并购买最知名的 IP 来争夺市场份额。高浠媚、陈有禄（2022）认为由于影视企业不仅经营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与销售，还广泛涉足广告、综艺节目等媒体娱乐衍生业务。在财务管理方面，多样性的业务存在导致资金分散的可能性，为规模经济不足、融资等问题埋下隐患。

在内部控制领域，郑军（2011）指出，多数影视企业通过并购进入该行业时，面临着企业治理结构上的问题，如不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过度的个人主导管理风格。这种治理结构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弱化的内部控制环境，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经营者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杨子铭（2017）认为影视企业在内部治理和控制体系相较于其他成熟行业，完整性存在确实可能，在企业的日常经营中内部控制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原因是未能有效整合子公司。同时，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影视企业在审计实践上也面临挑战，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扩展性使得审计应用存在规范性不足和高风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变革传统的审计理念，增强风险意识，并加强现代信息系统的运用，促进审计实践。孔德泰（2017）一方面探讨影视企业内部管理和审计机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风险管理意识和内部审计和同样对审计工作至关重要。关于公司内控的重要性，张黎焱（2019）指出影视企业关于报表透明度的问题，认为企业对于内控信息的披露透明性，甚至相关的高风险领域的信息都未主动进行公开披露。依据其研究给出的方案，普及并统一风险管理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电影行业的长久持续监管迫在眉睫。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核心的研究。在王灿（2019）的研究中，研究者指明关于影视企业内部控制的若干问题，如应该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对风险评估的多重因素进行评估，对这些内容的忽视来源于部门间信息沟通障碍和内部控制流程执行不力，都源与影视行业自身特性息息相关，其中包含影视制作的高风险性和时间成本投入，高时效性与轻资产为主的经营模式和国家监管政策的变化。楼琦（2020）在已有文献基础上补充到，相关的风险管理部门成立影视企业具有绝对重要性，区分个个个风险活动控制，是影视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以及风险控制的重要部分。

1.2.3 对赌协议相关文献

(1) 对赌协议机理研究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

作为一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广泛使用的有效投资工具，关于对赌协议的研究起始于

海外，并已逐渐成熟。最初的概念由 Hecht（1967）的文章中提出，强调了对赌协议在大幅降低交易失败风险方面的作用。继之，Aharony 和 Swary（1980）指出，对赌协议通过传递上市公司的质量信息，帮助股东形成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正面预期，从而避免了因业绩不达标而造成的股权或价值流失。在此基础上，Trigenorgis（1996）进一步阐述了对赌协议在企业并购中引入的事后调整机制的重要性，说明了它如何根据被并购企业实际发展情况进行调整，有效整合资源，减少并购产生的商誉。John（2000）开创性的从期权理论角度分析了对赌协议，认为它类似于一种实物期权，能够在投资市场不确定性下保障投资者的期权价值。Davis 和 Etheridge（2006）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对赌协议实质上是一种基于估值的定价期权模型，为未来不确定业绩的价格调整提供了机制，若并购企业未能实现业绩承诺，则并购方有权利行使调整权利，反之亦然。这一系列研究共同构建了对赌协议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基本概念到深入应用，揭示了其在降低并购风险、传递企业信息、及其作为投融资工具的多重价值。

对赌协议在签订时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关于赌协议的签署应用进入我国的时间是 2003 年，彼时摩根士丹利作为跨国界投资的代表，诸多海外投资集团与诸如同蒙牛集团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对赌，由此赌协议在商业中的实践中逐渐进入中国。

在对赌协议概念界定与其本质属性探讨研究部分，有的学者坚持赌协议作为期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此理念具有一定创新性，其中程锋（2007）做出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合同性质界定的工作，其发表的文献认为对赌协议是预算融资方未来盈利能力后而提出的要求，业绩承诺的参与双方由自身需求设计对赌条款。同时，关于对赌协议具有财务工具和期权双本质的观点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在刘冰（2009）研究中在对赌协议作为一种带有附加条件的估值方法同时，其存在的本身具有财务工具属性；作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对未来或有事项的保证，其以期权的形式存在为。在黄晓波（2011）的研究中，一方面，投资方为了保证财务投资的安全风险控制，痛死对赌协议的存在也是融资方也具备扩张野心。吕长江与韩慧博（2014）认为业绩承诺由对赌协议衍生而来，早期可看作是合同的约定，经发展完善后逐渐运用于并购交易中。潘爱玲与邱金龙（2017）认为在难以预见未来结果时，交易双方在融资或并购交易中倾向于签订该合约，作为对被并购方未来业绩的保障，其中高出被并购方本身价值的溢价相当于并购方支付的期权费。从法律的角度而言，朱欣民（2020）在其研究中指出对赌协议是一种具有“下行损失保护而上行利益分享”的非对称交易机制的契约。

（2）对赌协议效应研究

对于对赌协议的效应从两方面进行研究，其中一方是正面效应，信号传递正面反馈与激励机制风险分担为其组成部分。同样对赌协议作为双刃剑，也具备反面短视效应与收入利润操纵的反面效应。

从支持者论证角度，对赌协议不仅是一个能够核定被并购方估值的估值工具，还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根据 Aharony (1980) 的观点，企业如果签订了估值调整协议，就意味着标的企业具有预期的盈利能力，表明其拥有超过市场价值的实际价值潜力。这样的签约行为向市场发送了一个信号，该信号内容为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以便进一步吸引更多投资者，为企业拓宽业务模式，探索隐藏的机遇机会。Barbepoulos 等人 (2012) 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对赌协议能够有效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估值风险，并对员工管理产生积极的激励效应，减少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风险。Sulemena 等 (2019) 通过对加纳的 100 家风险投资企业进行研究，使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分析，结果显示，在并购活动中影响该活动推进的关键因素是对赌协议的签订，而估值调整协议与控制并购估值的风险成正相关。对赌协议作为一种创新的合约形式，不仅能够有效解决估值的不确定性，还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并购效率、促进公司治理等多重途径，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实质性的好处

国内与国际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由于学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进行，国内对于对赌的研究也起步较晚，而近年文献逐渐丰富。汤谷良和刘辉 (2006) 的研究针对摩根士丹利在华投资对赌，指出估值调整协议一方面可以控制投资者的风险，同时具备激励和约束投资者及经营者行为的属性。对赌协议的签署也称为一种权力制衡的公司管理新手段。米咏梅 (2009) 则强调了对赌协议的法律效应，指出外部压力能够增强企业内部及投资者关系的整体性与凝聚力，同时为投资方和融资方实现发展价值。陈瑶和杨小娟 (2016) 实证研究表明证明估值调整协议会被并购方与被并购方的主营业务所影响，业绩承诺产生的正面效应伴随着相关性增加而正相关增长，估值调整协议不但能提高被收购方的评估价格，还能正面促进其经营业绩。

从信号传递角度，Myers (1983) 研究提出了公司如何通过投资决策和融资策略来传递其内部信息的理论，通过内部信息比，选择公司对发行债券股票融资的选择。Levin (2003) 通过研究指出对赌协议通过业绩承诺的信号效应可以提高并购的协同效应。Dionne 与 Al (2015) 从新的研究方向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对企业所获取信息对赌协议在不同信息使用者角度有不同认知思维。而积极参与主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受到并购规模等因素的催化作用。许年行 (2008) 通过对 493 家签订业绩承诺的上市公司研究

过后，发现业绩承诺可以实现信号传递效用。吕长江和韩慧博（2014）得出类似研究结论认为业绩承诺可以产生类似积极作用，觉得业绩承诺除了能够促成高额溢价之外，同时可以提升并购的协同效应水平，释放积极信号，降低代理成本。翟进步（2019）指出降低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了重组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给高质量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并购机遇，也能带来更好的协同效果。任俊帆（2024）为证实中国股票市场的公告溢价效应，通过 2010-2021 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日度数据，证实公告溢价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未预测到货币政策公告释放信号，该类信号的不确定性需要更大风险溢价补偿。

对赌协议在为企业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潜在的负面效应，如短视行为和收入及利润的操纵问题。研究表明，这种短期导向的行为可能会损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性。关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Hirshleifer（2006）认为收购市场上的如若对被并购方进行了不合理估值所导致的结果即为，投资方对被投资标的多支付的过高溢价，增加成本的另一方面会影响融资方，在较差的市场反应里损失投资。Candman（2014）在其研究分中提到，对赌协议不仅只有激励效应的正面效果，激励刺激同时所引发交易风险负面效应也不容小觑。企业管理层可能因追求短期利益而忽略企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导致企业失去未来的发展的规划与降低长远规划的可能性。

在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研究中，学者邓平（2007）涉及业绩对赌协议的理论现象深入研究，并指出这类业绩补偿机制实质上对于股东来说存在不公平性。邓平强调，业绩对赌协议更多地体现为单方面的股东风险承担。进一步地，邓平发现，尽管这种对赌协议在短期内可能促进公司股价上涨，但从长期视角考量，它们可能阻碍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构成负面影响。关于对赌协议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张鹏（2021）在其研究中表明的观点阐明，上市公司激进的盈余管理等属于机会主义行为，而归类行为随着对赌协议中对违反所导致的补偿承诺的存在而存在正相关趋势。对赌协议签署的存在，会促使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履约期内前三年的业绩如若满足条款恰好达到业绩要求，比如盈利只比协议中约定业绩稍高，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公司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措施进行质疑，且在其后的审计工作中将其可能提高盈余管理水平列入关键审计事项。

（3）对赌协议的审计风险研究

在对赌协议作为一种高风险投资方式逐渐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在风险管理方面。Mathew 与 Cainm（2010）研究中表示，以 1993 年至 2003 年间 990 个包含业绩承诺的并购案例为样本，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评估在对赌协议签署中被所需要，其中包括

不限于投资者交易通道、企业估值、及业绩承诺条款的有效期限等。研究表明，在业绩承诺履约期间，业绩对赌多方必须对市场状况和企业需求进行全面评估，以降低由估值不确定性和道德风险带来的成本。Leonidas（2012）在估值调整协议复杂性的相关研究中强调，鉴于对赌协议的复杂性，在制定对赌条款时应全面考虑投资与融资双方的关系，包括支付方式、对赌期限、金额和目标等多个要素，以确保双方利益的平衡。

在防范对赌协议中的风险方面，根据李雅杰（2017）所提出的精进策略，即通过采用重复博弈的方法，在对赌协议设计时引入分阶段的条款，其目的意图减少参与双方的不确定性。孟方琳（2018）也在其研究中也支持了该思路，研究者提出了利用分层博弈策略来缓解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的精进策略。这是种允许合同的任一方在早期阶段如果发现结果不如预期时就可拥有自主选择去选择终止合同的保护机制。刘向强（2018）在其研究中提出，企业一旦签订了业绩承诺合同，其审计费用便会显著上升。孙召亮（2019）指出，共享审计（即并购双方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并购过程中的有效运用，不仅能显著降低并购溢价，还能有效减轻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并购方获得更多利益。

为了进一步降低对赌协议的风险，Sulemanna（2019）提出了业绩承诺条款设计的重要性。优化这些条款的手段，该手段的存在旨在可以为并购方和相关投资者信息使用者提供一个更安全的资本退出机制，规范投资者资金保护机制，控制审计风险。这些建议共同指向了通过精心设计对赌协议中的具体条款，以及利用博弈理论中的策略来减少风险，从而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提升交易成功率的目标。根据饶斌和周晓波（2020）关于收购前期风险管理的研究中，他们通过实证表明收购前期对价估值存在一定风险，所发生的风险可以通过对赌业绩补偿降低因估值导致的溢价支付。此外高翀和石昕研（2021）的研究表明，业绩承诺的完成与否与注册会计师给出的审计意见存在显著关联，特别是在企业未能达到业绩目标时，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

根据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对赌协议作为并购中的一种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问题，同时提供了一种对未来业绩的调整机制。对赌协议能够传递正面的企业质量信号，激励管理层优化业绩，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然而，它也可能引发企业的短视行为和收入利润操纵等负面效应，增加审计风险。因此，设计和执行对赌协议时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实现其积极效应并降低潜在风险。

1.2.4 文献评述

本研究中，文献研读工作围绕着研究课题在不同时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依

托审计风险形成机制，以提升审计质量为目的，进行文献分析。从影视行业、审计风险以及对赌协议三个方面检索，以中外及时间顺序进行归纳，通过文献之间相互关联的因子对研究选题相关结论提炼整合。

影视行业审计风险方面，相比于传统行业，影视行业在财务和经营特性上具有独特性。由于影视行业的核心价值往往寄寓于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品牌、艺人资源等，这不仅增加了其财务管理的复杂度，也为审计工作带来了额外的挑战。影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策略虽然能够拓展市场份额，但也容易导致资金分散和融资难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审计风险部分，文献综合探讨了审计风险的概念、产生动因、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审计风险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审计环境的变化，学者们对审计风险产生的动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如审计失败的法律诉讼风险、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盈余管理行为等，这些因素对审计风险的水平和审计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系统层面强调审计师在执行审计程序过程中，对信息化数据错误的识别能力对于防范审计风险的重要性。

关于审计风险的应对，文献指明可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优先进行并严格实施风险评估过程、审计费用对审计资源投入等方式进行改良。持续培训提升风险评估技能、更新审计方法和技术，以及从事务所和个人角度出发的多元化策略，是有效管理和控制审计风险的关键。

在对赌协议部分，文献工作追溯了对赌协议在外国资本市场的起源，突出了对赌协议作为有效投资工具的角色，旨在减少交易失败、解决未来绩效的不确定性，以及桥接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这些协议作为基于绩效的调整渠道，有效地在并购中整合资源，以减少商誉并通过传递关于公司质量和管理层绩效优化激励的积极信号维护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对赌协议旨在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代理成本，既是金融工具也是一种期权，虽然促进了企业价值提升和提供了针对投资风险的保护机制，同时也存在促进企业短视行为和操纵财务报告实践的风险。文献通过分析对赌协议的机理、效应以及在审计风险管理中的角色，凸显了审计实践中需要对这些特殊安排给予充分关注，以确保审计意见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经过大量文献研读可知，尽管在审计风险、影视行业特性、以及对赌协议的文献评述中，国内外学者的成果覆盖了诸多方面，如行业特征、审计风险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应对策略，以及对赌协议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仍旧存在研究空白领域可能值得进一

步探索。如影视企业签署对赌协议与审计风险的关联机制及不同行业在不同情形下选取的，本文也将在已有研究的理论实践成果基础上，对影视企业并购的特定的情况下进行审计风险模型完善。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本研究广泛搜集和整理了众多国际和国内的相关文献资料，综述了历史上学者对审计风险以及特别是影视企业审计风险的研究，为本研究的进行铺垫了理论基础。通过综合分析研读文献资源，研究不仅归纳了关于审计风险的研究成果，还为后续的讨论和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旨在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2）案例研究法

基于理论研究，本研究选择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结合对赌协议具体内容从审计风险及舞弊模型的角度出发，简要梳理了北京文化公司及其审计情况的基本概况，详细阐述了案例发生的背景。重点关注了北京文化面临的审计风险，包括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在报表层面和认证层面）及审查风险。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结合财务与非财务指标，对北京文化的审计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针对性地提出了防范策略。

1.3.2 研究内容及框架

（1）研究的思路

本研究目标在于深掘和界定对赌协议背景下影视企业面临的审计风险，并据此提炼出有效的风险防范和管理策略。整个研究被细分为六个主要章节，涵盖了研究的绪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形成及特性、北京文化公司审计风险案例研究、对赌协议下影视行业审计风险应对，以及结论和研究展望。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影视行业发展下企业扩张并购背后乱象频发的背景，引出并购活动中对赌协议的审计风险研究迫在眉睫。其次通过大量的文献研读工作系统回顾了审计风险、影视行业审计、对赌协议等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为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学术研究空白部分为该研究奠定其理论意义。最后研究内容与方法部分概述了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和方法论，明确了研究的结构和逻辑。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部分，从并购对赌协议和审计风险等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叙述，为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定义。引入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舞弊三角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构建了分析框架。

第三章“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形成及特性”部分，从行业特性出发，探讨了影视行业的业务范围、相关特性及其对审计风险的影响。分析了对赌协议如何影响审计风险的形成，揭示了其独特的风险特性。

第四章“北京文化公司审计风险案例研究”部分，详细介绍了北京文化公司的背景、对赌协议的设计及履行情况，以及案件的发展过程。针对该案例，从不同层次分析了审计风险的来源和表现，提供了深入的风险识别和评估。

第五章“对赌协议下影视行业审计风险应对”部分，提出了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的防范措施，建议了具体的审计对策。基于前文分析，提出了面对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的综合应对策略。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总结”部分研究的主要发现，提出了对影视行业并购活动中审计风险管理的建议。展望了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指导。

(2) 研究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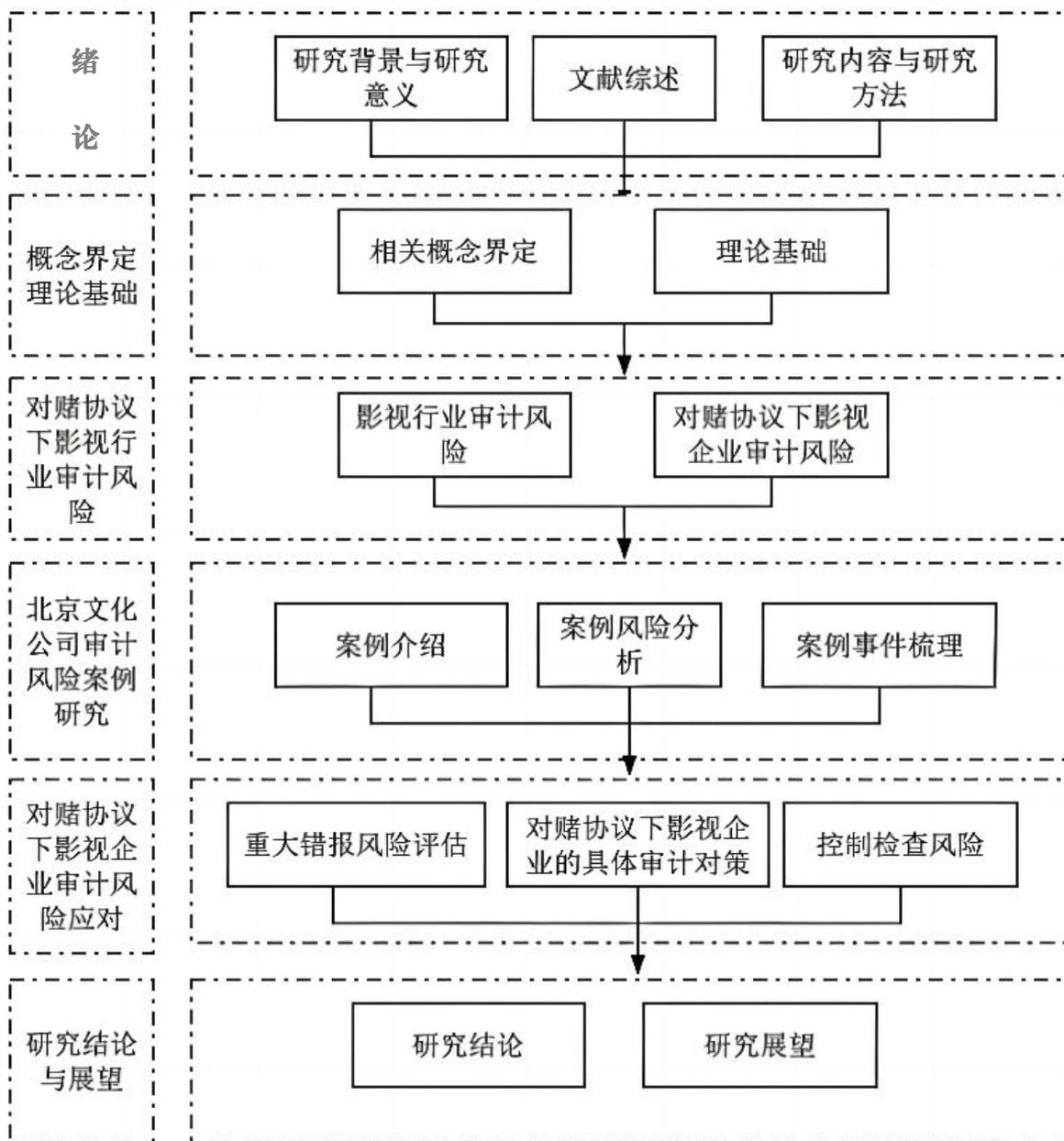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框架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并购对赌协议

并购活动是现代企业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兼和收购两种形式。兼并可分为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吸收合并是指合并后，合并方企业继续存在，而被合并方企业解散；新设合并是指多个公司合并后，原公司随着合并发生而注销。收购与吸收合并不同的地方在于，收购方虽然购买了被收购方的股份与资产，获得对后者的控制权，但被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依然保留。

在企业并购中，对赌协议是基于双方对被收购企业未来业绩预期的一种业绩补偿机制。亦称估值调整机制，是并购过程中用来缓解投资风险的一种常见协议形式。通常，此类协议详细规定了被收购方需在特定时间内达到一定的财务指标（如营收、净利润等），这些财务指标的实现对赌协议的核心内容。补偿形式主要包括股份补偿、现金补偿及股份回购。通过这种机制，对赌协议为双方提供了一套法律和经济框架，以确保并购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和风险控制。

2008年4月我国证监会出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53号），该管理办法的出台旨在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该办法首次对资产重组中签订对赌协议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上市公司购买资产时，应该提交该资产的盈利预测报告；第三十三条表明，预测采用收益法的，其主体被要求在重组后三年内的年度财务报告中特别披露关于预测利润与实际盈利数的差异，关于差异的部分需要特别签订补偿协议。

为从时间跨度确保财务披露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及时可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3日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该办法指引出相关管理要求，其中不再对重大资产重组中企业需对盈余预测做强制性规定，但增加了管理层要就此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当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以预期未来收益为标的基准时，为解决估值差异签订需补偿协议，也被规定需要披露预测于与实际的差异。

根据2016年9月8日，证监会对《重组办法》（证监会令第127号）进行的修订。其修订指明公司因发生以下情况，如向控股股东、控制人以及其所控股关联人以外的特定方，进行资产收购但并没有造成实际控制权变更的。该办法不强制要求签订对赌协议，

而交易双方可通过自主协商来确定业绩补偿方式。

2019年10月18日，证监会对于《重组办法》（证监会令第159号）进一步明确，其目的为强化重组公司业绩承诺的监督管理。以重组承诺执行中存在的各种情况对症下药，在《重组办法》的第五十九条中新增对业绩补偿的条款，有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当事人给予业绩补偿约定的部分，对未完成业绩补偿约定者，对其应采取相关措施。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8日发布，其中提及对赌协议的定义：在股权融资过程进行中，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公司未来发展不确定等问题，以减少投资者潜在损失为目标，双方通常会签订基于未来特定时期内是否达成预定业绩目标来调整估值的合同。

2.1.2 审计风险

根据《国际审计准则》，审计风险被定义为审计团队在面对存在缺陷的财务报告时错误地发出合规性意见的风险。《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01号——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及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于2019年2月20日更新相关条款，该要求对审计风险进行明确界定。本文审计风险的概念依托该条款，界定为注册会计师在面对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重大错误但并未有效识别，进而会错误发表审计意见的风险。

而通过现代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型，本研究中将审计风险界定为由以下两方面组成：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

重大错报风险一般被定义为：在审计活动开始之前，财务报表中可能已经存在的显著错误的风险。该风险通常是源于企业自身的操作或财务处理过程，需要审计师通过专业的判断来识别和评估，审计师不能通过增加审计活动来直接降低这种风险对审计结果的影响。分析此类风险时，审计师通常会从两个维度进行考量：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以及与特定财务认定相关的风险。另一方面，检查风险涉及到在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未被审计团队在执行适当审计程序后发现的可能性，属于审计过程中可以主观控制和管理的风险领域。

审计风险模型是审计过程中用于评估和管理审计风险的一个框架，该模型指出审计风险（AR）是固有风险（IR）、控制风险（CR）和检测风险（DR）的乘积。该模型帮助审计师识别和评估可能导致财务报表中出现重大错报的风险，以及确定需要执行的审计工作量来降低审计风险到可接受水平。审计师使用这一模型来确定在特定环境下，为降低审计风险到接受的低水平所需的工作量。通过对固有风险、控制风险的评估，以及对检测风险的控制，审计师可以制定出合适的审计策略，从而确保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2 理论基础

2.2.1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

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审计随着商业社会发展扩大，需要独立的第三方企业注册会计师开始为企业的财务报告提供真实性和公正性的合理保障。围绕着企业经营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发了委托-代理问题，审计的雏形逐渐诞生。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和企业运营的日益复杂，审计失败的事件不断增加，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时的流程框架及目标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演化。

基于对账项和制度审计发展，风险导向审计完成从传统方法到现代方法的发展转变。为有效地分配审计资源并提高审计效率，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应运而生。风险描述了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偏差程度，反映了一种预测上的不确定性。作为识别和管理审计风险的核心工具，审计风险模型是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一部分。美国会计师公会(AICPA)于1983年提出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该模型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的乘积，之后的审计风以及审计风险研究也在该模型基础上不断发展。

然而，该模型在区分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时面临挑战，并可能忽略了对财务报表整体风险的识别。对此，现代审计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更新的模型：审计风险 = 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其中重大错报风险由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构成，并涵盖了因交易复杂性、管理能力不足或舞弊行为导致的误报。检查风险关联于财务报告中未被发现的重大错报可能性，受审计师职业操守、能力及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审计师通过应用此模型来制定审计计划，包括决定审计费用、识别关键会计问题与审计领域，规划审计的具体安排，以及安排合适的审计团队。该模型同样适用于本文案例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的分析。

在审计行业内，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1101号审计标准，审计风险被定义为存在于财务报告中的重大误差，同时审计师可能发出错误的审计意见的风险，这可能对审计师的名誉和利益带来负面影响。

传统方法在评估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时往往较为宽泛，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则基于系统化思维和战略管理理念，建立了企业战略风险与财务报告风险之间的联系。

而现代审计风险不同于传统还在其独具的三个性质：审计风险客观存在的、具有潜

在性和可被控制。审计风险在审计活动中持续存在且伴随整个审计过程，无法消除只能通过恰当的审计程序来降低其影响。审计风险的潜在性表明，风险的存在和其引发的经济影响通常只有在审计误差被公开后才显现，且审计失败引发的后果无法通过现有的经济情况以及处罚规定进行预测。与之不同的是，通过审计流程的设计其审计风险是可以被控制，可通过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估，识别风险并制定相应审计策略，达到审计风险控制的目的。

从企业的战略管理视角出发，侧重于通过全面分析企业的经营战略以及行业特性，识别出审计的关键领域。该过程涵盖了基于风险评估来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和范围，是以结构化和目标为导向的方法。通过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来决定认定层次的审计风险完成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通过对重大错报风险的风险评估来决定对于检查风险的风险审核程序。通过以上审计风险模型上下贯穿评估审计风险，为出具审计意见打下基础。

其优势在于其全面性和策略性，能够确保审计活动不仅仅集中于表面的财务数据，而是深入到企业战略和运营的核心，提供更为精确和可靠的审计结果。

这种基于战略管理角度的审计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和全面考虑企业的战略、经营风险以及财务报告的可能错报，采取自顶向下和自下而上的综合评估，能有效地识别和管理审计风险，为形成准确的审计意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方法的应用能够增强审计工作的有效性，为相关利益方提供更加准确和全面的信息。

国际审计与保证标准委员会（IAASB）³在 2003 年对审计风险标准进行了更新，这一更新标志着审计领域向着更加精细化的风险导向方法的转变。其中“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模型成为注册会计师执行所有审计工作的基础和核心。现代审计方法侧重于将审计程序直接与评估风险联系起来，从而使审计师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存在较大错报风险的领域。更新的标准包括 ISA 500（修订版）关于审计证据，ISA 315 关于理解实体及其环境和评估材料错报的风险，强调了询问、分析程序以及观察和检查的结合，以评估这些风险的需要。ISA 330 关于响应评估风险的审计师程序，以及 ISA 200 的补充，涵盖了审计财务报表的目标和总体原则。

IAASB 对审计风险标准的 2003 年更新是现代基于风险的审计方法的基础。它强调了详细风险评估的重要性，以及审计师需要根据这些风险量身定做审计程序的需要，从而提高整个审计过程的质量和有效性。

³ Relevant to FAU, AA and AAA

2.2.2 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三角理论由 W. Steve Albrecht 教授首次指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舞弊行为的形成是受到压力、机会和借口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一理论，2002 年，美国会计师公会 (AICPA) 发布了第 99 号审计准则《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⁴，强调了注册会计师应保持怀疑态度和高度的职业警觉性，以便发现潜在的舞弊行为。

该理论具体阐释了舞弊发生的三个关键要素：

(1) 动机：是指促使个人或管理层采取舞弊行为的内部或外部压力，例如财务困难或个人贪婪。

(2) 机会：舞弊行为的实施通常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或情况，比如内控制度的缺陷或监督的不足，为舞弊行为提供了可行性。

(3) 借口：舞弊者往往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形式的道德或逻辑上的辩解，以减轻其内疚感并为其行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

三个元素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舞弊行为的基础。通过识别和减少舞弊的机会，增加对舞弊行为的监控和惩罚力度，以及通过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来减少舞弊的借口，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内部发生舞弊的风险。

2.2.3 信号传递理论

在面对信息不对称的挑战时，市场参与者经常遭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信息的优劣势方会尝试通过公开信息的方式，利用信号来传达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正是信号传递理论的核心观点。

根据该理论，当企业的当前市场估值与其基于经营业绩应有的估值存在显著差异时，为引起市场投资者及消费者的主义，企业通过发布反映其有利的业绩以及产业潜力信息的可能性。在面对信息不对称的挑战时，市场参与者确实会遇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逆向选择指的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质量较差的商品或服务往往会被市场选择，而质量较好的商品或服务则被排除在外。道德风险则发生在交易之后，当一方行为的风险由另一方承担时，可能会导致行为方从事高风险活动。

对于被并购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业绩承诺的签署能够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积极影响。它能够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且当中小投资者对报告进行解读时，

⁴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AICPA)Historical Collection,Fraud detection in a GAAS audit : SAS no. 99

理解为其利益受到协议约束保护。此时，业绩承诺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估值，因为该信息被市场理解为积极的信号，即公司对并购后的整体业绩有明确的预期和计划。此外，业绩承诺还有助于向监管机构证明并购交易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在并购活动中，监管机构需要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防止不正当的市场行为。业绩承诺作为一种明确的承诺，可以作为监管机构评估交易的一个重要依据，显示并购方对交易的认真态度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在该研究中，信号传递理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理解和分析并购中业绩承诺的深层含义及其对经济业务各个主体的影响方面。该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并购双方会选择使用业绩承诺这种机制，以及对赌协议签订作为一个信号，对不同信息使用者造成不同影响。该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分析业绩承诺如何作为信号影响并购双方和市场的行为和反应，帮助研究者分析对并购活动中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

3 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形成机制及特性

3.1 影视行业审计风险

3.1.1 影视行业业务范围

从概念角度，影视企业指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剧及相关影视作品的开发、生产、发行和放映的企业。此类企业可能涉及影视作品的策划、制作、后期制作、宣传推广、版权交易和市场分销等多个环节。影视企业在文化产业和娱乐业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产品不仅包括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剧，还可能涵盖纪录片、动画、网络剧、网络电影等新媒体形式的影视作品。

从运营特点的角度，影视企业有以下性质（1）创意依赖性：影视产品的制作开发依赖于创意和内容质量，所以差异化和市场吸引力是核心竞争力。（2）项目驱动性：影视作品的生产通常是以独立的项目形式立项投资销售盈利，每个项目都是一个独立的投资和生产主体。（3）影视企业的资本密集性：影视作品的制作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包括人员成本、设备使用费、场地租赁费等。（4）市场不确定性：影视作品的市场表现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观众审美的变化、竞争作品的上映、营销推广效果等。（5）版权与知识产权：影视作品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是影视企

业的核心资产，其收益往往依赖于作品的版权运营和授权使用。

从制度角度，在2012年，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⁵，其中详细阐述了行业分类的方法和原则。举例说明：如若一个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则该公司的行业性质就会划入划分到其相应行业类别中。若该公司任何业务收入都未达到此标准，但其存在某一业务其收入及利润超过该公司总收入及利润的30%且该业务占比最大，该企业的经营行业则归类到该业务所在行业当中。如果仍无法确定，就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这个指引，本研究所涉及的影视行业被划分到“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类目中“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影视行业的业务范围包括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品、制作、发行、放映，以及相关周边产品经营销售。

影视行业的产业链确实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出品、制作、发行和放映，每个阶段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责任，共同推动着影视作品从构想到观众的整个过程。

（1）出品阶段：该阶段主要为项目的启动阶段，包括剧本创作、资金筹集和项目立项等初步工作。出品方通常是整个项目的发起者，负责整合初期资源，包括确定主要演员、导演和其他关键创意人员，以及确立影视作品的基本方向和风格。

（2）制作阶段：随着项目的正式立项，制作阶段开始进行，包括场景搭建、拍摄、后期制作等一系列工作。这一阶段是整个影视作品形成的核心过程，涉及广泛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创意人才，如摄影师、灯光师、剪辑师和特效团队等。

（3）发行阶段：影视作品制作完成后，进入发行阶段。发行方负责将影视作品推向市场，通过与电影院、电视台和网络平台等渠道合作，安排影视作品的上映和播出。此外，发行阶段还包括影视作品的市场营销和宣传活动，旨在吸引观众关注和观看。

（4）放映阶段：最终，影视作品在各种渠道中向公众放映，包括电影院放映、电视播出、网络平台播放等。放映阶段是影视作品产生收益的直接来源，通过票房收入、版权销售和广告收入等方式为制作方和出品方带来回报。

整个影视产业链是一个复杂的协作系统，需要不同阶段的各方紧密合作，共同完成影视作品从构想到呈现至观众的全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一产业链还会继续演化，以适应新的创作和消费模式。本研究中，案例公司北京文化主营业务为电影出品方，为扩大经营增强市场垄断，降低中间费用而意愿通过兼并收购扩大经营范围。

⁵ 《指引》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7），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和中类三级

3.1.2 影视行业相关特性

影视企业涉及到影视作品的创作和制作、作品的市场营销、版权管理、国际发行等多个方面，其业务模式和收益结构复杂多样。影视行业由于其特殊的商业经营模式与市场竞争业态，该行业的相关特性也会体现在其财务数据当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高风险，要求投资者对于项目的潜在商业成功和艺术价值持有极高的预期。此外，投资于影视项目背后的是长期的制作周期，从项目启动到观众在影院观赏，可能跨越数年，期间任何环节的延误均可能造成资金损失，甚至项目失败。

为了对该行业的特性有更清晰的数据支持，本研究选取了截止 2024 年 3 月 12 日 A 股上市总市值排序前七的影视企业⁶进行财务数据分析⁷。通过数据横向直观比对，从宏观影视行业层面对其经营做出总结。以 A 股影视企业为样本，通过对七家影视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细致的比对和分析，通过其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八项财务数据占其总市值的比例总结影视企业普遍具备的经营特点及行业特性。具体数据如表 3.1 所示：

表 3.1：2023 年 A 股上市公司市值前八位影视企业第三季各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资产项目	芒果超媒	万达电影	光线传媒	东方明珠	中文在线	中国电影	上海电影
货币资金	25.11%	11.96%	6.91%	27.46%	0.72%	33.61%	5.19%
应收账款	8.44%	3.98%	1.42%	8.75%	0.34%	6.03%	1.09%
存货	3.47%	5.76%	4.16%	12.21%	0.08%	9.30%	0.08%
长期股权投资	44.57%	0.13%	12.55%	22.55%	1.07%	2.29%	1.75%
固定资产	0.29%	5.70%	0.08%	25.36%	0.08%	5.94%	1.47%
无形资产	15.31%	2.19%	0.00%	4.57%	1.18%	3.00%	0.27%
商誉	0.10%	11.97%	5.03%	0.32%	0.50%	9.14%	10.08%

数据来源:Wind 金融数据终端

由表 3.1 可见，中文在线和东方明珠的货币资金比例高于 25%，二者都是有线电视企业，拥有有线电视业务公司拥有较强的流动性和短期内应对风险的能力。而上海电影

⁶ A 股影视行业板块代码：BK0847

⁷ 数据来源：2023 年第三季度影视板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和光线传媒的货币资金比例较低，可能反映出这些公司在短期内的流动性压力。其中芒果超媒的长期股权投资占比高达 44.57%，无形资产高达 15.31%，作为这八家企业中唯一涉足网络视频客户端的企业，该公司试图通过对外投资拓展业务和提高资产价值，通过长期投资以期望获得长远的发展和利益。无形资产过高也反映了其作为网络视频客户端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以及购买的版权等无形资产。应收账款比例较高的公司如东方明珠和芒果超媒，或有面临回款周期长的问题。关于商誉占总市值的比重，八家上市中芒果超媒、东方明珠主营业务为广播电视，中文在线由于 2023 年 AIGC 概念的炒作导致其市值过高，其余五家企业主营业务都是电影电视剧出品、制作、发行以及院线运营。这五家电影制作企业都存在较高商誉占比，其中万达电影的商誉占比达 11.97%，可能由于并购等历史交易形成较高的商誉。

通过以上数据，中国影视行业内部公司之间在资产结构、流动性管理、无形资产占比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不同公司的经营策略和市场定位的多样性。整体而言，影视行业的公司更倾向于轻资产运营模式，强调无形资产的价值，同时也面临资金回流速度和资金利用效率的挑战。

通过以上影视行业财务数据及运营特点分析，影视企业的运营还存在以下共同特征：

(1) 轻资产性

影视行业与传统制造业相比，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其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显著不同于传统的重资产行业。在该领域内，无形资产如品牌影响力、版权、人才创意等，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每一部影视的制作都有其自有的资产购置，不依赖于长期的固定资产，往往采用轻资产模式运营，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少，侧重于知识和创意的投资。

轻资产企业在财务和运营模式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是较低的初始资金投入，由于不需要昂贵的工厂或设备投资，企业可以更灵活地调整其业务策略和生产规模，迅速响应市场变化。其次，由于知识密集型的特征，影视行业的产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视频内容都通常具有较高的附加值，能够创造出比传统制造业更高的利润率和盈利能力。该行业高收益，与其轻资产的性质紧密相关。虽然为轻资产，但影视制作的资产大量集中于其成本，因此其固定资产周转率较高。

由数据可见相比于重资产企业，影视企业主要集中在货币资金、无形资产等轻资产方面。数据不仅反映了影视行业轻资产运营的特征，也突显了这些企业依赖于知识和创意产权的商业模式。

（2）高市盈率

影视领域是文化传媒行业的一部分，特别强调价值投资的重要性，这一点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该行业被视为具有高创新性和成长性，得益于技术进步和观众偏好的演变，预计将继续实现快速增长。其次，影视产品的商业成功极大影响收益，一部受欢迎的作品能够带来显著利润，而不受欢迎的则可能遭受损失，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格外敏感，进而可能出现高市盈率。第三，影视作品的知识产权价值不容忽视，成功的影视作品能够通过衍生产品、游戏和主题公园等多种方式增值。第四，市场对某些行业的热情可能过高，促使投资者愿意为之支付额外溢价。第五，政府政策和外部资本的支持也可能促进影视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最后，拥有特殊竞争力的影视公司，比如一流的创意团队、出色的制作实力或独特的内容库，可使其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然而，高市盈率不一定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可能还反映了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过度乐观预期。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应考虑公司基本面、行业发展前景、市场竞争状况等多方面因素。近年来，明星开设工作室的趋势日益增加，影视公司通过投资这些由明星成立的公司，并与他们签订业绩承诺协议，向市场展示未来盈利增长的潜力，从而可能提升市盈率。

（3）高风险性

影视行业的财务舞弊风险主要体现在收入确认的复杂性上，包括票房收入、版权销售和衍生产品开发等多样化收入来源增加了财务管理的复杂度。在经营过程中，影视公司面临多种不确定因素，如政府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的激烈、作品是否受市场欢迎以及关键创意人员如主演或导演的变动等。这些风险公司很难从内部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增加了盈利的不确定性。同时，行业内较高的债务水平增加了财务风险，影视公司常常依赖外部融资以支撑高昂的制作成本，这不仅增加了违约风险，还可能促成财务舞弊的机会。

影视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资本周转是其企业运转的生命线。影视公司通常一年甚至数年打造一款产品。其产品为影视作品，每部作品从立项到上映都需要巨额的前期投资，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版权、剧本、场地建造及道具租赁、雇佣知名演员与创作团队等。在项目的早期阶段高额成本已投入项目开发中而相关的收益则需要等到作品完成并成功上映后才能逐渐实现，其制作期间充满了诸多不可控因素充满不确定性，投资风险极大。

以北京文化为例,该企业早在 2018 年对《封神》系列 IP 的研发和制作投入高达 3.58 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负担。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包括市场接受度、播放渠道的变化等,导致预期的收益并没有实现,反而在当年录得了 6.34 亿元的净亏损。到了 2020 年,公司面临更多挑战,如电视剧播放的中断等,加剧了现金流的紧张局面。为了缓解财务压力,北京文化最终不得不做出决定,以 6 亿元的价格将《封神三部曲》25%的收益权转让给第三方公司。这也是北京文化虽然擅长打造高票房电影,但其公司经营常年亏损的原因。

(4) 并购频发及高商誉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业规模和集群效应成为影视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规模较大的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实现规模效应;而集群效应则为影视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渠道,增强了其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和行业内的主导地位。

影视行业的扩张需求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驱动:

首先是市场竞争的加剧:随着消费者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影视行业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企业为了保持竞争力,通常需要不断扩大规模和增加内容产出,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其次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影视作品的分发渠道变得更加多元化。大型企业通过并购扩张,能够整合更多的平台和分销网络,降低中间差价,实现作品的更广泛传播和更高效的盈利模式。

再者可以提升技术和人才的集中,影视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的支持和专业人才的贡献。通过扩张,企业不仅可以吸纳和培养更多的行业人才,还能集中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促进创新和提升制作水平。

最后随着娱乐产业的融合发展,影视企业通过扩张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如通过网络游戏、虚拟现实、主题公园等,实现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和业务的多元化,以增加收入来源和分散风险。

然而,影视行业的扩张也伴随着风险,包括并购过高的溢价、文化融合的挑战、管理和运营的复杂性增加等。2011 到 2017 年,我国影视行业的企业并购活动持续上升,并在 2017 年达到高峰。而企业的并购则存在引发账面出现大量商誉的可能性,例如华策影视 16.5 亿元收购克顿传媒,其溢价高达 13.3 亿元,形成 406.3%的溢价率。而万达院线 12 亿高价收购慕威时尚,其溢价金额 11.6 亿元,溢价率 2922.6%。无形资产是影视行业的估值的一大组成部分,其估值参数的较大不确定性是出现高溢价的主要原因。

3.1.3 行业固有审计风险

如上文所言，影视行业具有高风险、轻资产、具有规模效应并购频发、多回款周期等特点，因此影视行业的审计面临来自多方面的风险，其特性具备特别且较高的审计挑战。其近年来，由于三年疫情对线下观影市场的冲击，影视行业整体趋于不景气，众多企业出现问题，受到了监管机构的关注和处罚，显示出审计工作的高度风险性。针对影视行业的特殊审计风险，可以从财务报表的准确性、资产价值的评估、审计过程的执行难度、版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行业独特性，以及业绩承诺和对赌协议的复杂性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例如：

（1）收入确认与财务错报风险：影视作品的长创作周期使收入和成本确认过程复杂，存在企业可能虚增收入或调整财报以美化业绩的诱因。

（2）资产价值评估的挑战：影视企业持有大量版权和 IP 资产，其价值易受市场变动和版权争议影响，对财报的可靠性进行冲击。

（3）审计执行问题：审计影视公司可能面临合同、授权审查的复杂性，以及数据验证和解释的难度。

（4）版权和 IP 的审计关注点：影视行业的核心资产为版权和知识产权，其合法性、归属和保护状态对企业财务状况影响重大。

（5）行业特殊性对审计的影响：制作周期长、高投资需求和市场表现不稳定等行业特性，对审计人员在评估财务状况时构成挑战。

（6）业绩承诺与对赌协议审计：这些协议的复杂性可能导致对其内容、合规性及实际履行情况评估的困难。

（7）市场竞争与监管压力：企业可能因应激烈竞争和监管要求采取不当行为，增加审计风险。

影视行业审计人员需综合考虑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合同履行情况、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全面审计，以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和可靠。

3.2 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的审计风险

在投资和融资活动中，对赌协议作为一种平衡双方利益的机制，其执行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定的差异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履约和兑现的阶段，涉及的审计风险呈现出独特的性质和挑战。这些风险的存在，直接关系到对赌协议的实际效果及双方的最终收益。

因此，对于影视企业这一特定行业，准确识别和有效管理对赌协议中的审计风险，成为确保业务成功和降低潜在损失的关键。

3.2.1 审计风险形成机制

对赌协议引发的风险起始于协议签署时的企业估值阶段，当被投资企业为了吸引更多投资和提升公司形象而接受过高的估值时，可能会忽视潜在风险以及与竞争者之间的能力差异。资本市场的信息公开不完全和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在初期的尽职调查不足，难以评估被投资企业的真实价值。为缓解因估值失误造成的损失，双方会通过通过对赌协议来确保未来能够实现与估值相符的盈利。然而，融资方在实现对赌目标时，因目标设置过高而难以达成承诺，不仅存在损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可能性，还会影响到企业的控制权和长期发展。

在对赌目标的压力下，企业管理层可能会采取短期策略，通过美化财务报表来造假业绩，失去真实性和完整性财务和经营信息会导致会计风险。在审计过程中形成审计风险。《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对赌协议的企业需要在年度审计报告中揭露对赌目标与实际业绩的差异，相关审计风险形成过程如图 3.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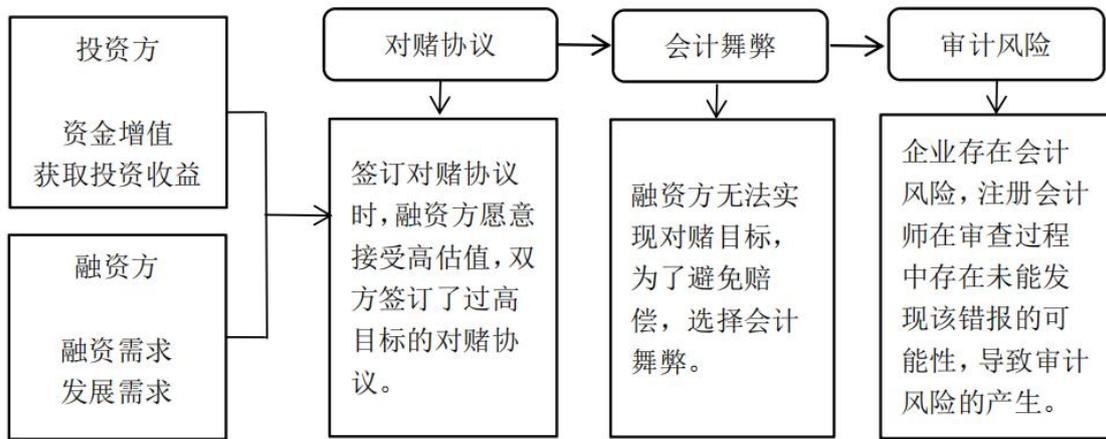


图 3.1 对赌协议下的审计风险形成机制

在并购对赌协议的背景下，审计风险的形成机制涉及多个方面，主要由企业估值的不准确性、财务报表的粉饰行为、以及管理层采取的短期策略共同驱动。这些因素不仅增加了审计的复杂性，也提高了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重大错报的难度。以下是并购对赌协议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形成机制的具体分析：

(1) 企业估值的不准确：并购初期，被投资企业可能为了吸引投资和提升公司形象，而接受过高的企业估值。这种过高的估值往往基于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乐观预期，忽视了潜在的市场风险和与竞争对手的能力差异。当企业无法实现这些乐观的业绩目标

时，就会产生对赌协议的履约风险。

(2) 财务报表的粉饰行为：为了满足对赌协议中设定的高业绩目标，企业管理层可能采取短期策略，如通过不当手段美化财务报表，虚增收入或隐瞒负债，从而使得财务报告失去了真实性和完整性。这类财务舞弊行为直接增加了审计风险，给审计人员的判断带来困扰。

(3) 短期策略的采用：在对赌目标的压力下，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短期行动以迅速提升业绩，如提前确认收入或延后确认成本。此类行为虽然短期有助于业绩，但会损害企业的长期财务健康和稳定性，为审计人员识别真实的财务状况增加难度。

(4) 信息公开的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公开和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被投资企业的真实价值。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投资方在进行初期的尽职调查时存在盲点，增加了未来的审计风险。

(5) 财务与经营信息失真：为了实现对赌协议中的业绩承诺，企业可能采用不适当的会计政策或进行积极的盈余管理，导致提供给审计师的财务和经营信息失去了准确性。

3.2.2 审计特性

在对赌协议环境下，影视企业面临的审计挑战受到行业特性及协议要求的双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持续舞弊风险：典型的对赌期限介于3到7年，其中3年最常见。这意味着，从协议签署开始，直至期限结束，企业存在持续的舞弊动机。这段时间内，由于外部如国家政策和企业管理架构的变化，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增加。在对赌期间，企业为了吸引资金，可能会过分美化财务状况；为了达到过高的业绩目标，可能造假账目；为了避免兑现期的责任，可能在报表中隐瞒或歪曲事实。对赌协议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加之审计工作的局限性，使得发现这些舞弊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其中影视项目的生产周期较长，相应的对赌协议通常跨越数年。在此期间，企业为了满足或超过业绩目标，可能会持续进行舞弊，增加了审计过程中对业绩连续性和真实性的审查难度。

(2) 信息获取挑战：企业倾向于设定高目标的对赌协议来吸引投资，但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可能激励企业隐藏关键信息，误导信息接收者。失败的对赌结果曝光后，企业可能通过财务报表的操纵来避免损失，包括虚构交易或收入，这通常由管理层指示完

成，大大增加了获取真实对赌信息的难度，从而阻碍了有效的审计实践。

(3) 管理层的盲目扩张策略：对赌协议签订的企业往往资金不足以支持其发展，充分竞争的影视市场环境以及前文所阐述的影视行业的规模效应导致管理层采取高压扩张策略，影视企业可能实施高风险扩张策略，追求短期快速增长。这种未经充分规划的扩张可能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使企业无法达到对赌目标并进一步加剧损失，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对赌协议缺乏法律强制力，失败后的高额补偿往往遭到管理层拒绝，引发财务舞弊行为，增加审计难度。

(4) 财务报表处理复杂度：对赌协议的存在使得影视企业的财务报表涉及复杂的会计处理，如收入确认、成本分摊及与对赌相关的费用预提等，要求审计师具备精准的专业判断。对赌协议通常包含一系列基于未来业绩达成的条件，这使得收入确认过程变得复杂。影视企业必须评估这些条件在报告期内的完成可能性，并据此决定是否确认相关收入。这要求审计师能够理解与评估这些业绩目标的合理性及其对收入确认的影响。影视项目的成本往往需要在多个报告期间进行分摊，而对赌协议的存在可能会要求根据特定业绩指标对成本进行调整。这就需要审计师准确理解项目成本的性质、相关的会计政策以及如何根据协议条款进行合理分摊。如果存在不达标风险，影视企业可能需要根据对赌协议的条款预提相关费用。在此过程中要求审计师能够评估与对赌协议相关的风险，以及企业对这些风险的预期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以上所有因素都要求审计师具备精准的专业判断能力，以便对影视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的相关事项进行恰当评估。审计师需要综合考虑行业实践、会计政策、以及具体协议条款，从而做出合理的判断。

综上所述，对赌协议的存在使得影视企业的财务报表处理更加复杂，要求审计师不仅需要对行业具有深入的理解，还需要具备高度的会计和审计专业技能。这对审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包括对特定交易和安排的理解，也包括对影视项目本身商业模式和运营逻辑的把握。通过案例研究可以更直观反应以上内容。

4 北京文化公司审计风险案例研究

4.1 案例介绍

4.1.1 案例选取依据

自 2019 年起，北京文化频繁成为负面新闻的焦点，从当年的巨额亏损到随后的管理层冲突，以及证监会对其信息公开违规的调查，直至 2021 年初爆出的“郑爽阴阳合同”事件，使得北京文化不断受到公众关注。接连不断的事件揭示了北京文化在内部管理上存在重大缺陷，并引发了对其财务舞弊和资本操作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公司与世纪伙伴等企业签订的对赌协议引起了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选择北京文化作为研究案例的理由包括：

（1）案例的代表性：北京文化在对赌协议相关的审计问题上表现出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如项目投资份额收益权的虚假转让、收入和利润的虚增等。

（2）对赌协议的显著性：北京文化的案例突出了对赌协议问题的显著性，其通过欺诈手段来实现对赌，成为研究对赌协议下审计风险的理想案例。

（3）行业背景：鉴于本研究聚焦于影视企业的对赌协议审计风险，选择一家经营业务范围具备代表性的影视行业内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相符，北京文化为此提供了深入了解行业内审计问题的机会。

（4）公众和学术关注：该案例在公众和业界引发的关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交流和传播的平台，增强了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综合以上因素，将北京文化及其收购世纪伙伴的事件作为研究案例。

4.1.2 收购方北京文化影视有限公司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文化”），是一家在 A 股上市的娱乐传媒企业成立于 1998 年，股票代码 000802。最初公司依托旅游文化资源，通过对娱乐产业链的整合，构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北京文化产业生态，产出多部稳定而优质的作品，确立了在文化行业的领先地位。北京文化最初的业务集中在旅游领域，包括妙峰山、潭柘寺等著名景点，涵盖酒店餐饮服务。由于旅游业务增长乏力，特别是在政府对文化旅游行业支持减少的背景下，公司决定转型，将焦点转向当时热门的影视行业，并通过一系列并购活动，自 2013 年到 2020 年成功转型为影视娱乐公司。

在 2010 年 7 月，华力控股以 5.4 亿元收购北京旅游 26.67% 股份，成为最大股东。华力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丁名山，与王健林私交甚好，可能是这段关系促使北京旅游向影视业扩张。2013 年底，公司以 1.5 亿元收购了光影瑞星传媒公司全部股权，随后更名为摩天轮文化。摩天轮文化由宋歌领导，他曾成功投资多部著名电影，带领公司进入影视投资和资本操作领域。

2014 年，公司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化。经过两年筹备，2015 年北京文化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 29 亿元资金，该定向募资最大的认购方为保险公司生命人寿。在生命人寿注资之前，直至生命人寿董事长张峻被调查，生命人寿都是北京文化最大股东。在这过程中，宋歌作为董事长，尽管没有直接持股，却成功引入了占公司 30% 股份的影视资本，两大股东生命人寿和华丽各持约 15% 股份，通过资本平衡加强了对公司决策的控制。同年，宋歌出任北京文化董事长，标志着公司全面投入影视业务。虽然当年业绩平平，但通过出售控股物业和政府拆迁补偿，公司净利润实现正增长。此后，公司清理非核心业务，宋歌开始专注于影视投资和资本运作，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4.1.3 被收购方概况

(1) 世纪伙伴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伙伴（全称世纪伙伴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成立，注册资本 5,277.65 万元，其主营业务为电影电视剧出品制作。公司实控人为娄晓曦。其股东结构如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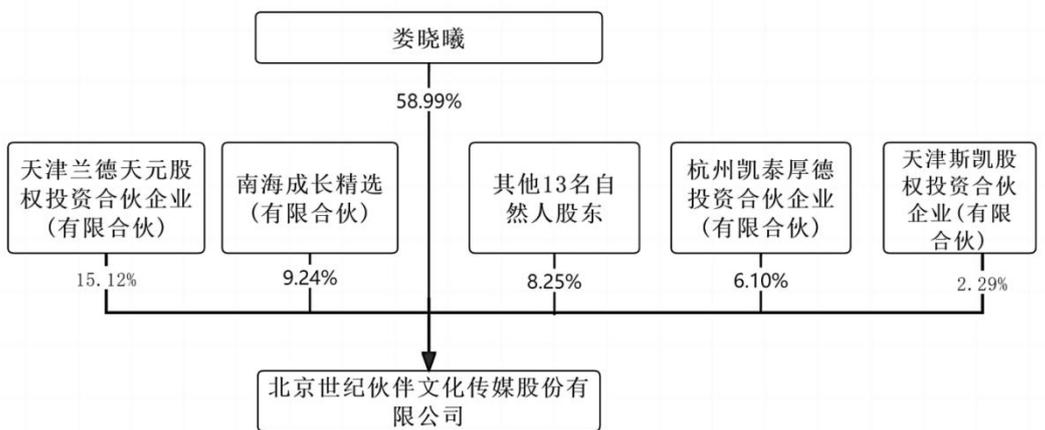


图4.1 世纪伙伴股权结构

世纪伙伴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如表4.1：

表4.1 世纪伙伴基本财务状况表（单位：万元）

科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50,187.42	72,470.42	73,750.08
总负债	33,338.03	35,698.79	37,517.81
所有者权益	16,956.29	36,771.62	36,232.27
业务收入	16,029.78	30,943.05	1,364.13
利润总额	4,453.73	12,711.57	-719.15
净利润	3,323.60	9,492.21	-539.36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2020]04月30日电

通过上表对 2013 年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世纪伙伴被并购总资产自 50,197.42 万元增长至 73,750.08 万元，该公司在这段时间内资产规模，在企业行业扩张期发展迅速，期间出品的电视剧《外姓兄弟》、《勇敢的心》、《红色》等为企业创造高额收益，也使得收购方世纪伙伴具有较大的未来预期估值。

公司总负债 2013 年为 33,238.03 万元，2015 年 6 月 30 日增加至的 37,517.81 万元。较高的负债及财务杠杆，在高风险性以及低存货周转率影视企业较为普遍。

所有者权益从 2013 年 16,959.39 万元增长至 2014 年 36,771.62 万元，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略有减少至 36,232.27 万元。2014 年所有者权益的显著增加反映了公司利润的增加、资本注入或股东增资等因素。2015 年的略微下降是由于分红、亏损导致。

这些数据揭示了公司在资产和负债管理上的积极策略，同时也指示出该公司在被收购前盈利能力、资本结构和财务健康度方面可能存在的挑战。尤其是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反映了公司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内部经营效率和财务决策的综合影响。

2013 年至 2014 年，业务收入从 16,029.78 万元增长到 30,943.06 万元，几乎翻倍的业绩显示显示公司在这期间业务扩张显著，收入增长强劲。然而，2015 年上半年，业务收入骤减至 1,364.11 万元，

2014 年公司利润总额达到 12,711.58 万元，较 2013 年的 4,453.63 万元增长了约 186%，反映了公司盈利能力的显著提升。2015 年上半年，公司利润总额转为负值，为

-719.14 万元，盈利能力下降战。

净利润的趋势与利润总额相似，从 2013 年的 3,323.59 万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9,492.23 万元，反映了公司利润率的提高和经营效率的增强。到了 2015 年上半年，净利润亦为负值，达到-539.35 万元，说明公司不仅损失了部分收入，还需要承担额外的成本和开支，导致净利润为负。

这些数据揭示了世纪伙伴在短期内经历了从快速增长到突然亏损的转变，外部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 2015 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需要公司对策略进行仔细审视和调整，以应对盈利能力下滑的挑战。骤降的利润解释了世纪伙伴意愿被北京文化收购的动机。

(2) 浙江星河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星河于 2012 年成立，注册资本金额 500 万元人民币。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著名经纪人王京花，主要从事艺人经纪业务。浙江星河的核心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强大的运营能力。在并购时，该公司已与 50 多名艺人、导演和编剧签约。王京花最初被知名演员陈道明聘任其经纪人。随后在 18 年的时间里，她助力打造了超过 80 位明星艺人，其中包括李冰冰、范冰冰、任泉和白百合等。截至 2015 年 6 月，浙江星河对两家公司进行全资控股，分别是西藏星河京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北京京艺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与母公司基本相同。浙江星河股东结构如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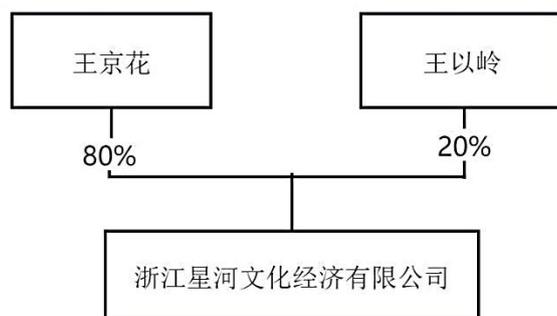


图 4.2 浙江星河股权结构

由股权机构图可见，2015 年六月，浙江星河被收购前，其最大股东王京花以百分之八十的持股比例对该公司由绝对控制权，且王金花还对一家名为西藏金桔的公司拥有百分之百控股权，该公司的是北京文化对浙江星河收购项目中融资的出资方。在某些情况下，收购方提供融资是为了与被并购方共担风险，特别是在被并购方的业务存在不确定性或市场波动较大时，通过融资可以增强双方合作的稳定性。

浙江星河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如下表 4.2:

表4.2浙江星河基本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会计科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6,760.121	4,649.345	6,352.351
总负债	6,009.822	1,593.351	527.913
所有者权益	750.353	3,055.992	5,824.447
业务收入	6,228.312	8,835.563	4,156.046
利润总额	4,540.273	6,677.952	3,045,582
净利润	3,414.362	5,485.899	2,768.448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 [2020]04 月 30 日电

从 2013 年到 2014 年,该样本业务收入增长了 2,607.25 万元,增长比率约为 41.83%。利润总额从 2013 年的 4,540.27 万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6,677.95 万元,增长了 2,137.68 万元,增长比率为 47.10%。

净利润从 2013 年的 3,414.36 万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5,485.89 万元,增长比率为 60.64%。2015 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 2,768.44 万元,这表明公司的盈利能力稳健,即使只考虑半年的数据。其盈利状况表明公司在研究期间经营效率高,盈利能力强。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显示了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业务扩张能力。净利润的增长更加显著,反映了公司在控制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方面的成功。有助于王京花面对北京文化的收购时有提出较高议价。

4.2 案例事件梳理

4.2.1 案例事件发生

(1) 并购目的

北京文化多次并购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公司进军影视行业的经营策略,意图从北京城西旅游场所经营转向影视出品制作,并且实现规模垄断。董事长丁明山为拯救长期亏损

的北京京西旅游业务，与 2013 年实施战略转型。经过对宋歌的引入以及多项并购，公司的主营收入结构已基本实现了这一转型目标。

（2）并购时间线

北京文化轰轰烈烈的并购扩张可追溯至 2013 年 12 月北京京西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北京文化）收购北京光景瑞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光景瑞星），从而使主营业务从文旅行业跨界进入影视行业。2014 年 1 月收购后，北京光景瑞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后文简称：北京摩天轮）。

光景瑞星董事长宋歌，早在 2008 年光景瑞星已主营电影行业，相继出品“非常完美”“失恋三十三天”等几部高收益电影，据有关报道显示，宋歌目标打造一个垄断性影视企业。2010 年宋歌在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邀请下担任万达影视的总经理，就任期间曾向王健林申请 10 亿资金将万达电影打造为集院线制片经纪艺人管理等于一体的影视公司，最后申请并未成功。2013 年宋歌重新回到其创办的光景瑞星，而宋歌对于打造影视垄断集团的战略与彼时迫切需要转型的北京文化战略不谋而合。

北京文化为进行对光景瑞星的收购，选择通过定向增发募资，最大的认购方为保险公司生命人寿。在生命人寿注资之前，北京文化最大股东是华力控股，其后生命人寿的加入使其成为北京文化的首要股东，直至生命人寿董事长张峻被调查，华力重新成为最大股东。在这过程中，宋歌作为董事长，尽管没有直接持股，却成功组成了占公司 30% 股份的影视资本，两大股东生命人寿和华丽各持约 15% 股份，通过资本平衡加强了对公司决策的控制。

2013 年 12 月 23 日北京文化与北京的最大股东宋歌百分之百股权持有的西藏名隅精泰投资有限公司（后文简称：“西藏名隅精泰”）签署了 1.5 亿元的股权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扩张其影视行业业务。在北京文化董事长推荐丁明山的推荐下宋歌进入北京文化董事会担任副董事长，并担任副执行总裁。

其并购时间线对价如下：2013 年 12 月 23 日北京文化与西藏名隅精泰投资有限公司（此次并购中光景瑞星的出售方，下称“西藏名隅精泰”）及宋歌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价 1.5 亿元。2014 年 1 月 14 日至 2017 年 4 月 11 日期间北京文化分别支付分五笔交易价款为：3,000 万元、3,500 万元、1,500 万元、2,000 万元、2,500 万元。具体交易时间如表 4.3：

表4.3北京文化收购光景瑞星交易对价

时间	事件
2013年 12月23日	北京文化与西藏名隅精泰投资有限公司(此次并购中光景瑞星的出售方,下称“西藏名隅精泰”)及宋歌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价1.5亿元
2014年 1月3日	首笔支付款项3,000万元
2014年 1月9日	完成过户及标的股权的工商信息变更登记
2014年 1月14日	支付款项人民币3,500万元
2015年 3月5日	支付人民币1,500万元
2016年 5月12日	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
2017年 4月11日	支付人民币2,500万元 支付尾款2,500万元

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2020]04月30日电

2014年,北京文化收购了影院经营公司爱美影投,接着完成定增募资33.14亿元,引入保险资本富德生命人寿。分别以13.5亿和7.5亿高溢价收购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并签下对赌协议。北京文化不惜下血本收购,其实是项庄舞剑真正的意图,或许只是为了买人,世纪伙伴的娄晓曦曾是华谊兄弟的影视剧负责人,手底下聚集了业内诸多高水平从业人员如影视制作人边晓军,编剧严歌苓等,出品了“少帅”、“49日祭”等众多电视剧,而星河文化的王金花是国内金牌经纪人,旗下有陈道明、梁家辉、李冰冰、刘嘉玲、胡军、等50多著名演员。收购完成后,娄晓曦和王金花也顺势进入到由颂歌主导的资本局,北京旅游改名成北京文化。

2014年公司正式开始着手收购世纪伙伴和浙江星河。方案多次修订,2015年年底获批,于2016年完成实际收购工作。

北京文化收购世纪伙伴及浙江星河时间线如下文表4.3所示:

表 4.3: 北京文化收购世纪伙伴及浙江星河时间线

时间	发生事件
2014 年 5 月 12 日	北京文化非公开发行, 募集所得资金用于收购世纪伙伴与浙江星河影视文化公司, 发行股票 324, 459, 895 股, 募集资金 28.94 亿元。
2014 年 10 月 17 日	根据《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及《评估报告》, 正式签署《股份购买协议》/《股权购买协议》。收到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2015 年 12 月 11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2016 年 4 月 5 日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完成对世纪伙伴和浙江星河的收购。

数据来源: 中国证券报[2020]04 月 30 日电

北京文化为此次并购共募集资金 28 亿元, 主要用于支付收购世纪伙伴 13.5 亿元和浙江星河 7.5 亿元的价款, 以及偿还之前的银行贷款。其中, 世纪伙伴当时的账面净资产为 3.6 亿, 附带的业绩对赌协议中承诺 2014 年至 2017 年分别贡献 9,000 万、1.1 亿、1.3 亿和 1.5 亿。加上 4 年的业绩承诺总计 8.4 亿, 远低于 13.5 亿的收购价格。这主要是因为募资对象中有两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投资了 8.1 亿, 因此北京文化实际只支付了 5.4 亿就获得了价值 8.4 亿的世纪伙伴控股权。

(3) 交易对价

案例中的样本为 3 家公司, 分别是对宋歌的光景瑞星(后改名北京摩天轮)、娄曦曦所控制的世纪伙伴以及王京花所控制的浙江星河进行收购。第一次收购为丁明山主导, 后两次为宋歌主导。分别奠定北京文化跨入电影业电视剧业以及最后对于制作发行商的统一战略。经评估和交易, 北京文化在三轮并购过程中总计支付了近 21 亿元, 总共形成商誉 158,763.57 万元。其中北京摩天轮商誉约 11,185.14 万元, 世纪伙伴商誉约 83,438.36 万元, 浙江星河商誉约 64,140.07 万元。

北京文化动用了 28 亿的筹资额主要为了收购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 并用部分资金偿还之前的银行借款, 对于世纪伙伴的收购, 支付了 13.5 亿的价格, 而星河文化的收购成本为 7.5 亿。观察世纪伙伴的收购细节, 其所具有的账面净资产为 3.6 亿, 而根据业绩承诺所显示, 2014 至 2017 年分别期望贡献的利润为 9000 万、1.1 亿、1.3 亿和 1.5 亿, 加上净资产总值为 8.4 亿, 这个数目低于收购价格。收购价之所以高于业绩预期, 原因在于融资的一部分来自于被收购方的股东, 特别是两家公司西藏金宝和新疆嘉梦, 它们共同投资了 8.1 亿, 实际上北京文化的出资为 5.4 亿, 用此金额购得价值 8.4 亿的

世纪伙伴。

当回顾北京文化为了收购世纪伙伴而募集的 28 亿元，主该收购款用于收购世纪伙伴星河文化以及用于偿还账面的长期负债，世纪伙伴的收购价格为 13.5 亿元，星河文化的收购价格为 7.5 亿元。其中世纪伙伴收购时账面净资产 3.6 亿，附带的业绩对赌协议中承诺 2014 年至 2017 年分别贡献 9,000 万、1.1 亿、1.3 亿和 1.5 亿。3.6 亿净资产加上业绩承诺一共是 8.4 亿元，即使不通过复利系数计算，其对价也少于 13.5 亿。

通过募资来源募资的来源可以对该反常现象找到解答，这次募资的对象分别为西藏金宝与新疆佳梦，其实控人皆为娄晓曦，一共投资 8.1 亿，所以北京文化实际出资额为 5.4 亿，同时也稀释了北京文化本身对世纪伙伴的控制权，为娄晓曦与北京文化管理层的矛盾埋下隐患。

在另一方面，星河文化的净资产及四年的业绩承诺合计为 3.6 亿，而西藏金桔的投资 2.8 亿使得总投资额为 6.4 亿，仍低于 7.5 亿的收购价格，展示了实际控制人王京花的出色谈判能力和对未来收益的信心。王金花的星河文化账面净资产 5,800 万与 4 年的业绩承诺之和，共计 3.6 亿元。而融资方同样存在王金花实控公司西藏金桔，王金花该企业投资额 2.8 亿。

北京文化相关并购交易对价如表 4.4 所示：

表4.4 北京文化并购交易对价

项目	估值方式	评估价 (万元)	评估基准日 账面价值 (万元)	净资产 评估增值 率	最终交易价 格 (万元)	购买溢 价率
北京 摩天轮	收益法	17,004.84	3918.79	334.17%	15,000.00	282.76%
世纪 伙伴	现金流折现 方法(DCF)	138,174.9 2	36.232.28	281.35%	135.000.00	272.61%
浙江 星河	现金流折现 方法(DCF)	79,824.42	5,824.45	1272.25%	75.000.00	1187.67 %

数据来源：中联评报字[2015]第 1104 号

(4) 舞弊分析

动机：在北京文化的案例中，动机可能来源于以下方面，被收购方为了满足对赌协议中规定的业绩指标，可能存在虚增收入或利润的动机，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例如通过业绩承诺获得的奖励或避免处罚。北京文化作为收购方，为了维持股价稳定，吸

引更多投资者，可能会包庇或忽视被收购方的财务舞弊行为。

机会：影视行业的特殊性在于其收入和成本的不确定性较大，这为财务舞弊提供了机会。例如，通过会计估计调整、收入确认时机控制等手段来粉饰报表。再者如果相关监管机构未能有效监控并购过程中的业绩承诺和实际完成情况，或者审计机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将为舞弊行为提供机会。

借口：案例中会将舞弊行为合理化为“行业内普遍现象”，认为这是“行业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从而在心理上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到借口。

被收购方或收购方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通过舞弊维持公司运营或股价稳定是为了保护股东利益，避免公司面临更严重的经营危机。

4.2.2 对赌协议设计及履行情况

在追求战略转型和快速跻身影视行业的过程中，北京文化选择了通过支付高价进行并购的方式。目的是为了迅速扩大在影视领域的影响力。通过和被收购公司约定业绩承诺，北京文化试图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反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从企业的角度使中小股东对投资放心。这种业绩承诺的做法，北京文化是对收购公司的一种期望表达，也体现了对被收购公司未来表现的信心。

同时，被收购的标的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估值，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业绩承诺。这不仅增加它们在并购过程中的议价能力，也是一种向北京文化展示其价值和增强双方信任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个双向动作：北京文化通过并购实现快速增长和行业布局，而被收购公司则通过承诺优异的未来业绩来获取更高的估值和市场认可。

（1）业绩承诺金额及完成情况

在次次并购中，各方达成了相关具体的业绩承诺，具体细节和承诺的金额可以在文档的一个表格中找到。对于北京摩天轮而言，其净利润承诺是基于其母公司的净利润来计算的，但是会从中扣除那些不常见的损益。而对于世纪伙伴，计算其净利润的时候，会比较扣除不常见损益前后哪个数值更低，然后采用更低的那个。浙江星河的净利润计算方法也是如此，并且在计算时还会考虑税收减免和政府的补助。

在本次并购活动中中，各方就对赌协议中业绩承诺的部分达成了协议，具体的交易明细、业绩承诺数额以及对价完成情况详见表 4.5。简而言之，北京摩天轮的净利润承诺是基于扣除非常规性损益后的母公司净利润。世纪伙伴浙江星河的业绩履约计算方式，是将政策补助与税收减免计算在业绩内，加上承诺的净利润加扣除非常规性损益。

收购明细如表 4.5 所示：

表4.5 北京文化并购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被收购方	承诺期间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	税收优惠	完成率
光景 瑞星	2014	1,537.04	4,201.82		273.36%
	2015	2,441.92	925.17		37.88%
	2016	3,043.08	3,172.53		104.26%
	2017	4,023.44	3,452.31		85.84%
	Average	2,761.21	2,937.94		125.32%
世纪 伙伴	2014	9,000.00	9,386.66		104.31%
	2015	11,000.00	11,267.60		102.42%
	2016	13,000.00	13,529.69		104.06%
	2017	15,000.00	15,005.08		100.06%
	Average	12,000.00	12,298.01		102.72%
浙江 星河	2014	4,970.00	4,860.38	630.31	110.48%
	2015	6,530.00	6,871.31	639.97	115.01%
	2016	8,430.00	8,673.92	133.94	104.48%
	2017	10,040.00	8,312.83	187.12	84.66%
	Average	7,492.50	7,179.40	397.84	103.66%

数据来源：Wind 金融数据终端

(2) 业绩承诺补偿方式

关于并购各方具体的承诺业绩的补偿方式在下文进行具体阐述。北京摩天轮的支付安排设为分阶段进行，其中首阶段支付在合同生效后 7 个工作日完成，第二阶段支付则在交割日后 7 个工作日进行。对于之后的支付，将根据每年的业绩承诺，在年度结束后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报告，基于实际净利润是否达到预期来确定是否支付。如果摩天轮的实际净利润未达预期，则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调整支付额，若有不足，则由北京摩天轮前股东西藏名隅精泰进行补足。西藏名隅精泰负责人宋歌承诺对所有盈利补偿承担无限责任。

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为：应补偿金额等于到期末为止的累计预测净利润减去累计实际净利润及已支付补偿金额。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检测到的减值金额超过已支付补偿，西藏公司需对北京文化进行额外补偿，计算公式为需额外补偿金额等于期末减值额减已支付补偿金额。

额外补偿将首先用北京文化尚未支付的交易现金对价冲抵，如不足，由西藏公司用

现金补足差额。这一系列措施旨在确保并购后的业绩承诺得到满足，同时保护了投资方的利益。

关于北京文化对于世纪伙伴及浙江星河的补偿，业绩补偿的说明描述了两种补偿机制，主要涉及：现金补偿和股票补偿。其“认购方”指的是世纪伙伴/浙江星河，它们承诺通过自有资金进行现金补偿，或者如果现金不足，通过转让其所持有的北京文化的股份来补偿差额。主要通过现金补偿、股票补偿，以及减值测试的方式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和股票补偿是指如果认购方不能用现有的现金资金全额进行补偿，那么它们可用持有的北京文化股份来补偿不足的部分。

股票补偿计算方式根据一个公式进行计算的，要求当年应补偿的金额减去认购方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然后除以认购方的认购价格。具体公式如下当年补偿股份数=（当年应补偿金额-认购方已支付的补偿金额）÷认购方认购价格。

关于减值测试部分，需要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此之前北京文化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而其减值测试时间为承诺的年度期限结束时，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业绩补偿机制是确保如果目标股权的价值下降，认购方会以现金或股票的形式补偿差额，以确保北京文化的利益得到保护的审核机制。

（3）其他保障措施

在本次并购过程中，涉及的各方均达成了涵盖三年竞业禁止的承诺协议。世纪伙伴同意为母公司独家服务，并受限于服务协议，未经北京文化许可不得变更，期限最长至2019年11月12日，其他协议期限介于2016年底至2018年底之间。

浙江星河的关键成员签订了为期六年的独家服务协议，开始于2014年8月，承诺在竞业禁止范围内提供专属服务。通过这些承诺，可见北京文化在完成业绩承诺方面的有进行盈余管理嫌疑。

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北京摩天轮的平均达标率较高约125%，存在年度波动；而世纪伙伴每几乎年均能精确达标，几乎无波动，引发对其盈余管理的质疑；而浙江星河平均达标率只达到97%，该数据并未计入税收优惠，表明业绩完成的质量存在疑问。

补偿机制方面，北京摩天轮的补偿以现金形式进行，在承诺期内的实际收款超出条款金额，减弱了补偿约束的效力；世纪伙伴和浙江星河的补偿基于溢价差额，实际收款亦超出承诺金额，显示出补偿机制的约束力不足。

承诺期结束后的表现进一步暴露了问题，尽管设有独家服务等保护措施，核心团队的离职及业绩下滑对北京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2018年及2019年，公司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降，2019 年还计提了大额的商誉减值准备，凸显了并购后的风险与挑战。

4.2.3 事件经过

北京文化事件因其副董事长在微博爆料公司财务造假而发舆论关注，以及大额营业收入虚增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最早关于事件发生于于 2020 年 4 月 8 日，北京文化发布公告承认其存在会计差错，声明其 2018 年度投资收益权转让确认收入核算不符合会计准则，调减 4.6 亿元营业收入。

4 月 29 日北京文化股价开盘集合竞价期间，出现了异常现象，以跌停交易盘口堆积了二十万手卖单，无法成功交易。当日原副董事长娄晓曦通过声明曝光，内容涉及公司董事长宋歌、董事张云龙多项罪名，举报北京文化多项收入均为虚构，且董事长宋歌曾通过售卖世纪伙伴所有 IP《拼图》为董事长所控股的子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其中“倩女幽魂”和“大宋宫词”两项应收账款皆为造假。而娄晓曦所披露该两部电视剧收入与公司发布的披露公告中的会计差错更正的收入相符。而在事件发生后，4 月 29 日深圳交易所向北京文化发出了关注函。5 月 25 日，北京文化及其审计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否认了娄晓曦发布内容的真实性，称其为不实信息。六月深圳交易所正式向北京文化发送了关于其期间会计差错更正问题的年报问询函，特别询问了负责 2018 年审计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被问询方两次延期，未回复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次年 1 月 4 日，证监会对北京文化正式执行立案并于 11 月 15 日深交所对中喜会做出处罚。1 月 13 日深交所对北京文化及相关责任做出处罚。

4.2.4 处罚结果

(1) 对北京文化的处罚

2021 年 8 月 27 日，北京文化公司因违规行为受到了北京证监局的行政处罚，包括警告和 60 万元的罚款。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对北京文化进行了公开谴责。北京文化的主要负责人同样遭到了北京证监局和深交所的处罚。具体处罚情况如表 4.6 所示：

表 4.6: 主要责任人的处罚情况

姓名	职位	处罚机构	处罚内容
宋歌	董事长、总裁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30 万元
		深交所	公开谴责
娄晓曦	副董事长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 30 万元, 禁入证券市场 3 年
		深交所	公开谴责且公开认定其三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管人员
张云龙	董事、副总裁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30 万元
		深交所	公开谴责
陈颖	电视剧部总经理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20 万元
	世纪伙伴副总经理	深交所	谴责
贾园波	财务经理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 10 万元
		深交所	谴责
陶蓉	董事	北京证监局	警告, 罚款3 万元
丁江勇		深交所	通报批评
杜扬			

资料来源: ST 北文:关于收到北京证监局《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2021-08-27

北京文化公司的舞弊涉及多项严重违规行为, 包括虚构收入、内幕交易等, 而对其的处罚却远远不够。北京文化公司的违规行为涉及到了市场的公平与透明, 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危害了市场的健康发展。然而, 监管部门对于这些违规行为的处罚却显得过于宽松, 仅仅是给予了轻微的处罚, 三十万的没有对公司管理层造成的损害相适配的制裁。监管处罚过轻也容易导致市场上的违规行为愈演愈烈。如果对于严重违规行为不采取有力的处罚措施, 就会给其他公司以观望、模仿的错误示范,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乱象, 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4.2.5 审计经过

(1) 事务所简介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是一家成立于 1985 年且位于北京的审计机构, 于 2013 年专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截止 2020 年北京文化财务舞弊曝光, 其员工已发展壮大至包括 452 名注册会计师的六百名员工, 业务收入近 30, 945. 26 万元人民币, 属于中型企业。

2020 年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评级，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排名靠前，位于第 34。

（2）审计过程

自 2006 年起直至 2019 年，北京文化的财务及内控审计长期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包揽。直至 2019 年北京文化停止中喜对其的审计服务，也是由于二者业务合作长达 14 年服务年限过长，对外公布的解释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满足北京文化所要求的审计时间。

关于解除多年合作审计关系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而改聘新事务所的疑问，北京文化在发布的改聘公告中解释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无法满足对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时间的要求”。

审计期间，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深入了解北京文化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内部控制等，组建专业团队执行审计工作。此过程包括了详细的企业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与评价，以及根据审计计划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审计团队与北京文化的各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而形成了细致的审计策略和计划。在所有审计活动完成后，审计师汇总信息，经过多层复核和讨论，形成审计报告。此报告在内部质检后，由合伙人签字，最终完成。在长达 14 年的审计委托服务中，审计方一直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直到 2020 年解除合同续约，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才出现带强调事项的保留意见。此处合理怀疑，审计方在了解北京文化内部财务舞弊存在曝光风险和管理层意见不合，寻求在监管前止损退出。

因无法满足 2019 年年审的时间要求，北京文化原本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喜被替换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对北京文化 2019 年的财务报表发表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并就内部控制发表了含有强调事项的无保留意见。2021 年 1 月 12 日，聘请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然而，仅两个多月后的 3 月 27 日，北京文化取消了中审众环的聘用，改为聘请苏亚金诚事务所负责 2020 年度的审计工作。此时距离年报公布的截止日仅剩一个月。可见北京文化对于发布的审计报告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最终为北京文化的 2020 年财务报告发表了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对 2020 年的内部控制发表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在两年时间里，北京文化连续更换了四家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这暗示了公司的财务状态和内部控制系统可能存在重大问题，给审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北京文化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出具的审计意见如表 4-7：

表 4-7：北京文化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类型

年份	事务所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2006-2018 会计年度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标准无保留意见	标准无保留意见
2019 会计年度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标准无保留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2020 会计年度	苏亚金诚事务所	保留意见	否定意见

数据来源：北京文化审计报告

北京文化在 2014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年报均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同时，作为其审计机构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也在 2017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年报审计中受到了问询。这种频繁的问询揭示了北京文化年报的异常风险较高，同时指出中喜会计师事务所面对的审计风险也较大。

特别地，2020 年，北京文化的新审计机构苏亚金诚对其内部控制发表了否定意见。紧接着，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北京文化的股票遭到深交所的“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被更改为“ST 北文”，表明了其上市地位的特殊警示状态。

这反映出北京文化在其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上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并对其上市地位产生了影响。作为多年的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因未能勤勉尽责，未能及时发现和报告这些问题而受到批评。

（3）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

因在 2018 年对北京文化财务报告的审计中存在多项问题，违反了相关的审计和信息披露规范，北京证监局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及两位负责的签字会计师发出了警告。同时，北京文化也因为 2018 年涉及的“大宋宫词”和“倩女幽魂”两部电视剧的财务处理问题，被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2018 年 7 月，娄晓曦控制的世纪伙伴将 15%的有关“大宋宫词”的投资收益以 1.085 亿元出售于海宁博润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并在 2018 年的财务报告中记账为 1.018769 亿元。同时，世纪伙伴与雅阁特传媒公司就“倩女幽魂”60%的收益权转让达成协议，以 3.8 亿元的价格出售，尽管实际支付的费用为 5500 万元，且该交易并非在 2018 年完成，这笔业务也被错误地计入 2018 年的财务报告中，金额为 3.584906 亿元。进一步的调查揭示，实际上这两部电视剧的收益权转让并未出售，相关的交易资金是由北京文化董事长宋歌寻求的外部公司提供，通过虚假转让业务创造了一个不存在的资金流动，导致世

纪伙伴的财务报告虚假报告了两部电视剧出售的收益权，使得公司在 2018 年的报告中虚报了 4.603774 亿元的收入，占总收入的近 40%，虚增了 1.910802 亿元的利润，占净利润的近 60%，从而严重虚假记载了财务报告。

4.3 审计风险分析

4.3.1 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1) 政策风险：广电总局于 2022 年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限制了曾经有不良行为的艺人重新返回该行业，这一政策对那些还未公开发行的影视作品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如果这些作品中有涉及的艺人。例如，2020 年，郑爽因涉及代孕及偷税漏税事件而被广电总局全面禁止出境，与之相关的北京文化出品的电影“倩女幽魂”也被禁止上映。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影视行业面临的严格监管环境，政策的快速变化可能导致企业的影视作品无法进入市场，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和财务状况。

(2) 市场经营风险：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影视行业不断发展，但消费者的审美也在不断变化。市场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成功作品，也有一些被高度期待的作品最终表现不佳。由于电影票房收入与作品的口碑紧密相关，一个作品的成功很难预测。影视行业的市场变化快速，使得影视作品在上映前很难确保其最终效果，影响了企业的收入和利润。

(3) 公司高管出逃：北京文化子公司世纪伙伴总经理娄晓曦在发觉公司财务舞弊存在安全风险后早在 2019 挪用资金并出逃海外的事件，导致企业大量核心人员离开。而与之一同带走的是北京文化电视剧网剧业务，该事件直接导致成本大幅上升，收入大幅下降，最终导致公司决定在 2020 年将世纪伙伴的全部股份出售，反映了人员流失对企业经营的巨大影响。2019 年，北京文化旗下世纪伙伴公司遭遇核心团队大量离职的危机。作为北京文化电视剧和网剧业务的主要运营团队，世纪伙伴人才流失给该业务板块带来了沉重打击。

在世纪伙伴核心管理和创作人员集体出走后，北京文化并未能及时补充新的人才，导致多部影视剧项目陷入停滞，无法继续开发投入，只能将已投入的制作成本全部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数据显示，2019 年北京文化电视剧网剧业务的毛利率同比下滑高达 1814.48%，制作成本同比增长 176.5%，但收入却同比下降 95.51%。公司不得不为这些搁浅的影视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近 850 万元。世纪伙伴的生产运营能力遭到严重冲击，北京文化最终判

断其无法持续经营,于2020年决定将手中100%股权对外转让。

(4)在高溢价并购方面:在2013-2014年,北京文化高溢价并购了世纪伙伴、星河文化及北京摩天轮三家影视公司。

具体来看,北京文化在2014年收购世纪伙伴时,支付对价13.5亿元,但所获标的资产公允价值仅5.2亿元;同年收购星河文化,支付7.5亿元,但所得资产公允价值只有1.1亿元;2013年收购摩天轮,交易价格1.5亿元,也远高于其0.39亿元的资产公允价值。北京文化之所以在并购时愿意支付如此高昂的溢价,主要目的是吸引世纪伙伴的娄晓曦、星河文化的王京花、摩天轮的宋歌这些影视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借助他们的资源和能力助力公司影视业务快速扩张。

而北京文化愿意支付高溢价的重要前提,是三家标的公司均作出了未来4年内实现不低于一定金额利润总额的业绩承诺,分别为世纪伙伴4.8亿元、星河文化2.99亿元、摩天轮1.1亿元。一旦标的公司未能完成业绩承诺,则需要按协议对北京文化进行现金补偿;反之业绩超过预期,北京文化则会对标的公司团队进行股权激励。可见,北京文化此番并购投资的高溢价风险,完全寄托于标的公司未来的业绩承诺能否顺利实现。

4.3.2 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1) 收入的认定

新的收入确认准则把“控制权转移”视为收入确认的核心时刻。在电影和电视行业,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影视作品的销售,这一点与常规的商品销售流程存在明显的差别。北京文化的做法是,只有在电视剧完成拍摄、经过相关审查获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后,以及当电视剧的副本、播映带或其他形式的载体转交给买家,并且预期会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时,才会确认收入。这个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比如拍摄的进度、是否通过审查获得许可证以及交付的具体方式,给影视公司在确定收入确认时间点上带来了挑战。由于影视作品的价值往往很高,过早确认收入可能会对公司的当年收入和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于影视公司来说,如何判断收入确认的时点,不仅关系到收入和利润的准确反映,还关联到审计人员需要关注的风险。

举例而言,“大宋宫词”在2018年6月开始拍摄,并在同年7月将15%的投资份额以1080万元的价格出售,尽管当时该剧还在拍摄中且未获得发行许可。另一部作品“倩女幽魂”,虽在2019年6月开拍且在2019年8月20日完成,但直到2020年4月底才提交审批。尽管如此,北京文化却分别在2018年7月和2018年12月确认了这两部剧的销售收入。这种基于合同签订日期而非电视剧实际交付状态来确定收入确认时点的做

法，违反了收入确认的准则要求。这种处理方式可能会导致收入和利润的计算错误，鉴于这两部电视剧的销售金额巨大，可能会增加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风险，审计人员需要特别注意。

（2）商誉的认定

从 2013 年开始，北京文化采取了积极的并购策略，吞并入了包括北京摩天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以扩张其在影视领域的影响力。这一策略导致了大量商誉的积累。在进行这些并购时，北京文化对被收购企业的未来表现抱有较高的期望，例如，对北京摩天轮、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的并购中，评估的增值率极高，特别是世纪伙伴的股东权益价值在评估时几乎是其账面净资产的五倍，最终的交易价值基于评估师的估值，形成了巨额的商誉。然而在 2020 会计年度，北京文化以远低于收购价格的金额将世纪伙伴的全部股权出售，引发了外界对于初次收购价格是否过高的疑问，同时也暴露出并购策略的风险。

影视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政策变化使得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加剧，特别是当企业的盈利主要依赖于难以量化和价值波动的无形资产时，过高的并购溢价可能导致商誉过度计量，增加了商誉减值的风险。实际上，北京文化的商誉在其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在 2016 年到 2020 年间异常高，尤其在 2019 年减值测试前，这一比例超过了 30%，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表明了公司面临的显著商誉减值风险。

为了避免相关的风险发生，审计师需要对企业过往的业绩、当前的项目发展以及未来规划进行全面的评估，同时考虑行业趋势和政策变化对企业未来收入和成本的影响。通过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和现值计算，审计师可以评估是否需要商誉进行减值准备。北京文化在 2019 年对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的商誉进行了全额减值处理，反映了准确预测的重要性。

此外，北京文化在 2020 年对多个项目进行了大额的存货跌价准备，表明了对这些项目未来开发价值的质疑。这种情况不仅凸显了影视行业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审计的复杂度和挑战。审计师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需要采取综合考虑可变现净值和成本的方法来评估存货价值，这要求审计师深入理解行业特性，并进行周密的风险评估。

4.3.3 检查风险

（1）行业特性未充分了解

影视行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审计师具备行业特定的知识和理解。由于影视行业与其他行业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缺乏对该行业深入理解的审计师可能难以准确识别和评

估行业内特有的风险，从而增加了在审计过程中可能忽略关键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审计师需要积极获取影视行业的相关经验和知识，以提高识别和应对行业特定审计风险的能力。

（2）审计程序的未精确执行

确保审计程序的严格执行对于维护审计质量至关重要。以北京文化为例，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倩女幽魂”时，未深入评估其对公司财务的重大影响，并在执行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审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主要问题包括未实施审计计划中的策略、对内部控制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必要的控制测试，以及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不足。这反映出在执行审计程序时，需要对审计策略的实施、对内部控制机制的理解和测试、以及与被审计单位沟通的质量给予更多关注，以确保审计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实质性程序缺失

在执行“大宋宫词”销售收入的审计过程中，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没有确保收入确认中控制权转移的准确性。具体来说，尽管世纪伙伴与海宁博润签订了销售合同，但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海宁博润尚未支付款项，且合同缺乏明确的签署日期。这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宋宫词”的控制权已转给海宁博润，表明这笔收入的确认是不恰当的。这一发现突显了中喜在实施重要审计程序方面的不足，特别是未能对付款条件和合同细节进行充分的审查。

在审计“倩女幽魂”的销售收入时，同样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虽然有与雅格特的销售协议，但由于世纪伙伴在确认收入后仍负责该剧的后续制作和发行，这表明控制权并未实际转移给雅格特，因此该收入的确认同样不当。此外，关于著作权的归属在协议中并未明确，而且在剧集制作前期就以预期价格进行了权利转移，这些都是审计中应重点关注的异常指标。

特别是在处理“倩女幽魂”转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如著作权归属不明确、以预期发行价格预售以及投资详情的不透明等，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和评估，从而导致了对于这些收入确认的错误判断。这些问题反映了中喜在执行“倩女幽魂”销售收入的审计工作时，未能严格遵守审计标准，缺乏必要的专业怀疑态度，说明了其实质性审计程序执行上的疏漏。

（4）未能保持职业怀疑态度

在审计实践中，维护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原则，这意味着注册会计师必须始终对所接收的信息保持警觉，对可能出现的错误或者欺诈行为保持警惕，并

且要深入批判性地分析审计证据。这个原则特别强调，即使是来自被审计实体的信息，也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尤其在审计证据的可信度存在疑问时，应当加强审计手段以确保得到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遇到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商业决策似乎不合逻辑或出现可能指向欺诈的信号时，应当特别加以注意。

举例而言，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北京文化 2018 财年的报表进行审计时，特别是在审计“大宋宫词”和“倩女幽魂”的收入确认方面，几乎完全依据合同签订的事实来判断控制权是否已经转移。然而时间来到到 2020 年 4 月，北京文化对这两项收入的确认作出了会计差错更正，该现象暴露出了先前审计证据与实际情况之间的不一致。面对深交所就这两项收入确认发出的关注函，中喜会计师事务所仍然坚持其审计意见是恰当的，显示出了它们没有充分保持职业怀疑精神。

在审计北京文化及其子公司的并购活动时，存在的业绩承诺和高溢价支付暗示了潜在的欺诈风险。尤其是当世纪伙伴和星河文化达到了业绩承诺的精确目标时，本应引起对可能欺诈行为的高度警惕。然而，中喜对这些潜在的欺诈动机或迹象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并且没有采取附加的审计措施来面对这些风险，这表明了它们在保持职业怀疑方面的不足。

因此，在对北京文化的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未能表现出应有的职业怀疑态度，尤其在处理收入确认这一关键审计问题时。这种态度上的缺失影响了审计意见的准确性，提高了审计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在面临潜在错误和欺诈行为时，未能实施有效的审计应对。

5 对赌协议下影视行业审计风险应对

5.1 重大错报风险识别与评估

5.1.1 识别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1) 准确识别企业经营风险

在识别签署了并购对赌协议的影视企业存在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时，审计人员必须深入理解企业的经营风险，这包括外部因素如政策变化、市场趋势，以及内部因素如诉讼、人员流失等。政策变化对于影视行业特别重要，因为它可能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营环境和盈利模式。因此，审计人员需要利用行业研究机构的专家意见来辅助评估这些风险，但同时要保持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这意味着在接受外部信息时，需要进行有选择性的信息筛选，并确保这些信息不会影响审计的公正性。

此外，内部因素如公司的诉讼案件、人员流失、管理层变动等，也可能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审计人员需要与企业的法律顾问和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沟通，了解相关情况，并评估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2) 关注业绩承诺

在对业绩承诺的合理性进行评估时，注册会计师需要关注被并购方的过往业绩、资源条件以及市场的变化等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帮助判断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并识别是否存在舞弊行为。特别是在利润操纵可能涉及的领域，如收入确认、成本核算、资产减值等，需要特别关注。这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有能力分析复杂的财务数据，还要有能力识别和评估相关的业务风险。

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需要特别关注业绩承诺的合理性评估。经过分析被并购方过往业绩水平、增长趋势，结合其资源条件和市场变化等因素，判断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此外，审计人员还应高度重视业绩承诺期内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业绩完成情况恰好达标、波动较大或承诺期后大幅下滑等，仔细分析背后原因，识别是否存在舞弊行为。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业绩承诺的合理性，注册会计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分析被并购方过往业绩水平和增长趋势：通过对比历史数据，审计人员可以判断当前的业绩承诺是否合理。如果被并购方历史上业绩波动较大或增长缓慢，那么高额的业绩承诺可能不切实际。

2. 评估资源条件：审计人员需要了解被并购方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

源和市场资源等。资源条件的充分性和合理性对实现业绩承诺至关重要。

3. 市场变化分析：市场需求、竞争环境、行业趋势等外部市场因素对业绩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审计人员需要通过市场调研和行业分析，评估这些因素对业绩承诺的影响。

4. 识别异常情况：在业绩承诺期内，如果出现业绩完成情况恰好达标、波动较大或承诺期后大幅下滑等情况，审计人员需仔细分析背后原因，判断是否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在实际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应特别关注收入确认、成本核算和资产减值等领域的会计处理，确保这些处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例如，可以通过对比收入合同和实际交付情况，评估收入确认的合理性；通过分析成本结构和成本控制情况，评估成本核算的真实性；通过市场价格和资产使用情况，评估资产减值的合理性。

（3）评估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针对影视企业在业绩承诺方面可能发生的舞弊风险，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确实能起到重要的防范作用，注册会计师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 股权结构合理性无论是股权过度分散还是高度集中，都可能导致股东监督缺位，给管理层制造舞弊机会。例如北京文化这种股权较分散的情况，以及有些影视公司存在大股东垄断局面，都会削弱内部约束，需要评估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2. 董事会监督有效性也非常重要，董事会应发挥管理层监督职能。如果董事与管理层存在重合，将难以起到制衡作用，甚至成为管理层舞弊的工具，需要审视其构成是否合理独立。

3. 独立董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需要检查其数量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影响独立性、是否勤勉尽责、是否有过度兼职情况等，判断其监督能力。

4. 良好的内控能有效预防和发现舞弊行为，需要评价被审计单位内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如是否对职责进行明确分工、是否设置相互制约机制等。

影视企业为了实现业绩承诺可能产生舞弊动机，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加强内外部的制衡监督，从而降低舞弊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当审慎评估上述几方面内容，确保被审计单位具备防范舞弊的基础条件，这对于审计发现问题、维护报表可靠性意义重大。

5.1.2 识别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

（1）关注商誉减值准确性

近年来，影视行业掀起并购浪潮，企业为实现资源整合和寻求新增长点，在并购过程

中普遍支付了远高于标的公司净资产的溢价对价,形成了大量商誉。而被并购影视公司拥有众多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收购方往往基于对其未来业绩的乐观预期,支付了高昂的商誉溢价。

进入 2018 年之后,影视行业的整体表现不佳,导致许多公司必须对商誉进行大规模的减值计提,会计师在审计影视企业时,应当特别注意商誉初始确认金额的准确性。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使用的预测参数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资产组金额和是否需要减值。而这些预测参数往往涉及被并购子公司未来的业绩预测。审计师应当向管理层了解各预测值的确定依据,必要时可寻求外部专家协助,并通过访谈客户等外部程序验证业绩预测的合理性。同时也要高度关注期后事项对预测参数的影响。

在影视企业并购过程中,收购方为了完成对被并购方的业绩承诺,可能存在粉饰商誉、虚增业绩等舞弊动机。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商誉的确认、减值测算全程保持审慎,严格核查各环节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防范可能的舞弊行为,确保财务报表质量。

(2) 关注存货的存在和完整性

影视公司存货主要由各类影视作品构成,其成本来源包括演员薪酬、场地费、道具费等诸多开支。对于这些成本,注册会计师需要重点关注其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存货成本被操纵粉饰。比如场地费、道具费等金额通常较大,审计人员应当评估其合理性,可与市场价格对比,或聘请外部专家协助评估。这些措施有助于确保存货初始确认金额的准确性。

另一个需要审计人员高度重视的问题是存货跌价减值测试。影视作品的可变现净值很大程度取决于未来的销售情况预测,而影视市场本身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给存货减值测试带来困难。面对这一挑战,审计事务所可以考虑建立影视作品销售收益数据库,根据题材、导演、主演、年份等多维因素综合分析预测该影视作品的未来收益能力,为减值测试提供参考依据。

由于影视行业业绩起伏较大,企业为完成业绩承诺可能产生操纵存货成本、虚增收入等舞弊动机。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存货各环节保持高度审慎,严格核查相关会计处理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防范存货会计信息被粉饰或操纵,确保财务报表质量。同时,建立影视行业数据库等大数据分析手段,也将有助于更准确评估影视作品的价值,识别存货潜在减值风险。

(3) 识别和应对收入相关风险

收入是衡量公司业绩的核心指标,但也是舞弊高发领域。对于影视公司而言,收入种

类复杂、确认条件较为特殊,使得收入相关的审计风险更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注册会计师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测试收入相关内部控制,全面了解并测试影视公司影视作品审批、销售、收款等业务环节的关键内控,查找控制缺陷,评估导致财务信息错报的风险。

2. 重点审查收入确认时点影视公司的收入确认需满足作品完成拍摄、取得发行许可、母带转移等多重条件。注册会计师应当深入研究准则要求,通过核查证据、函证第三方等措施,确认收入确认时点的适当性,关注是否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等舞弊行为。

3. 核查收入确认金额准确性,熟悉电影电视剧通过买断、分账等方式计算收入的不同方法,重新计算被审计单位收入金额,验证其准确性。同时也可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存货周转、现金流等多维数据,实施分析程序,辅助发现潜在异常。

(4) 股价与绩优财报的背离程度

从审计的角度,股价与绩优财报的背离可能存在多种风险:

1. 财务信息不准确:如若公司发布的是绩优财报,但股价却未能相应上涨或者出现下跌,可能表明投资者对财报的准确性或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该背离可能暗示财报中的盈利或其他关键财务指标被高估或存在虚报。

2. 市场信心缺失:股价表现不仅反映了当前的财务表现,还预期了市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如果绩优财报未能提振股价,可能反映出市场对公司未来增长潜力的担忧或对管理层决策的不信任。

3. 潜在的舞弊风险:绩优财报与股价背离的情况可能触发审计师对潜在舞弊行为的怀疑,尤其是在业绩被人为夸大以满足短期市场预期,而实际经营情况并不支持这种业绩表现时。

4. 大股东减持套现行为:股东减持套现的行为需要在审计过程中被特别关注。审计师会评估减持前后的信息披露是否充分、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或是潜在的财务信息不准确的问题。审计师还应关注公司内部对减持行为的管控机制和政策是否健全,以及是否有充分的内部控制来防止利益输送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审计师在面对股价与绩优财报背离的情况时,需要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通过深入分析财报数据的真实性、市场反应和公司未来的业绩预期,来评估和识别潜在的财务风险。这种分析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公平性至关重要。

总之,由于影视公司为达成业绩承诺可能产生舞弊动机,且行业收入确认本身就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注册会计师需要格外重视此领域存在的舞弊风险,全面测试内控有

效性, 严格审查收入确认时点和金额的准确性, 运用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保持职业怀疑, 结合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实施分析程序, 从而及时发现潜在的收入舞弊行为, 降低审计风险。

5.2 控制检查风险

在审计签署对赌协议的影视企业如北京文化时, 审计人员面临的挑战尤为复杂, 特别是在业绩承诺给企业管理层带来压力的背景下。舞弊行为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显著增加, 主要是因为业绩承诺未达标可能会导致管理层需要对母公司进行补偿, 从而激发舞弊的动机。因此, 检查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审计人员个人能力和经验的限制, 特别是当审计程序设计不恰当、经验不足或缺乏职业怀疑态度时。

针对性地设计审计流程至关重要, 不适宜的审计程序设置会增加审计风险。影视企业的经营模式与传统企业存在显著差异, 这要求审计流程必须考虑这些特殊性。审计过程中忽略影视行业的特定风险, 如过分依赖过去的审计底稿和资料, 不重视风险评估, 都会导致审计风险上升。此外, 由于成本效益的考量, 审计团队可能缺乏足够的专业素质和经验, 新员工和实习生的参与可能因为缺乏经验而易受被审计单位人员的误导, 影响审计的执行力。

保持职业谨慎性是审计工作的基石。良好的职业态度直接影响到审计工作的质量, 缺乏职业谨慎态度会显著提升审计风险。在北京文化的案例中, 审计人员在遇到财务指标异常情况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导致对北京文化 2018 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这是一个明显的工作失误。这种缺乏职业谨慎的态度, 未能有效识别并应对舞弊风险, 最终导致虚假财务数据未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业绩承诺方面, 北京文化及其子公司通过高溢价并购的方式形成高额商誉, 这为其业绩承诺带来了巨大压力。审计人员在这种环境下未能对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评估, 未能识别管理层完成业绩承诺的舞弊动机, 这表明审计人员在评估企业舞弊风险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 在具体的审计实践中, 对于“大宋宫词”和“倩女幽魂”这样占据大量存货金额的作品, 审计人员未能进行充分的销售确认和审计程序实施, 未能高度重视, 导致财务舞弊行为未被及时识别。因此, 审计人员在面对影视企业的审计工作时, 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特定环境和风险, 采取合适的审计程序, 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职业怀疑态度, 以确保审计质量和降低审计风险。

在审计涉及对赌协议的影视传媒行业上市公司时, 考虑到被收购方可能为了达成业绩承诺而采取的粉饰商誉或虚增业绩的行为, 以及收购方可能为了维持股价而包庇这些

财务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应采用一系列独创性的审计对策来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以下是一些建议：

(1) 深入理解行业特性和对赌协议细节：注册会计师应深入研究影视行业的运营模式、资金流向和风险点，特别是理解并购对赌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业绩承诺的细节、完成条件和可能的财务调整机制。这有助于识别与业绩承诺相关的潜在财务舞弊风险。

(2) 分析融资及收入来源的真实性：审计师应仔细分析被审计公司的融资渠道和收入来源，验证其真实性和可持续性。对于非常规融资或收入来源，需进行额外的调查和分析，以识别可能的财务风险。

(3) 检查股价与绩优财报的一致性：通过分析公司股价走势与公布的财务报告之间的关系，审计师可以识别股价维持和财务报表美化之间的异常关联。特别是在业绩承诺即将到期但股价异常维持高位时，更需警惕潜在的财务操作。

(4) 评估营收与业绩承诺的匹配程度：审计师应分析营收增长的合理性与业绩承诺的达成情况，识别收入确认是否符合实际经营情况，特别是对高风险的收入项目进行重点审计。如若企业会计业绩与协议高度重合，则对该部分重点审核。

(5) 关注资产完整性与应收账款回款风险：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师需要对公司报告的所有资产进行检查和确认，以确保这些资产确实存在并且记录得正确无误。重点对无形资产如版权、品牌 IP 等重点审查，以确认资产列表上报告的每一项都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审计师还需要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深入的分析，评估回收的可能性。这包括对大额应收账款和长期未能收回的账款进行重点关注，因为这些账款可能存在较高的不良风险，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流动性。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有大量的应收账款长时间未收回，这可能意味着这些账款收回存在问题，从而增加了财务报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6) 实质性测试：实质性测试阶段，审计人员应详细检查收入合同，确认收入的来源、金额和时间，特别是与对赌协议相关的收入。同时，通过收入匹配，将收入与相应的项目、合同和财务记录进行对比，确保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对各类成本支出凭证进行检查，核实成本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尤其对大制作项目的成本控制进行对比分析。此外，核实应收账款的存在性和回收性，重点关注大额和长期未收回的账款，对无形资产如版权和品牌 IP 进行重点审查，确认其存在性和合理性。

(7) 数据分析与异常检测：通过财务数据分析，将本期财务报表与历史报表进行对比，识别异常波动，并分析关键财务指标如毛利率、净利润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

检测异常变化。进一步，通过股价走势分析，审计人员可以识别公司股价与财务表现之间的异常关联，特别是在业绩承诺期内，确保财务报告内容与实际经营情况一致，防止财务报表美化。

(8) 高风险收入项目审计：在高风险收入项目审计中，审计人员应对“大宋宫词”和“倩女幽魂”等占据大量存货金额的作品进行详细审计，核实项目的销售记录、合同和收款情况，确保销售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高额商誉审计，评估高溢价并购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分析商誉与业绩承诺的关联，判断是否存在人为操纵的可能性。

(9) 审计总结与报告：在审计总结与报告阶段，审计人员应根据审计发现综合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风险，判断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并评估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根据审计结果出具审计报告，阐明审计意见和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内部控制和管理流程的建议，帮助企业降低未来的风险。

同时，审计师还需要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进行深入的分析。应收账款指的是公司因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尚未收到款项的金额。审计师会评估这些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即这些款项最终能否被公司收回。这包括对大额应收账款和长期未能收回的账款进行重点关注，因为这些账款可能存在较高的不良风险，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流动性。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有大量的应收账款长时间未收回，这可能意味着这些账款收回存在问题，从而增加了财务报表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审计师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和评估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通过采用这些审计对策，注册会计师不仅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影视传媒行业并购对赌协议下的潜在审计风险，还能提高整体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为投资者和市场提供更加真实和透明的财务信息。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财务舞弊与对赌协议带来的审计挑战为核心，通过对北京文化在对赌协议背景下的财务舞弊行为及审计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总结发现：在对赌协议的影响下，为了吸引投资或避免对赌失败，影视企业可能在不同阶段出现财务舞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粉饰财务报表，通过应收账款虚增收入，通过向被收购子公司融资进而虚增商誉。这种行为不仅在对赌协议签订前后存在，而且在协议期间和协议结束后，为了满足或重新设定的对赌目标，可能导致企业进入财务舞弊的恶性循环。

通过对北京文化案例的分析，揭示了在面对对赌协议引发的压力时，审计工作可能面临的独立性问题、审计风险评估不足及审计流程设计缺陷等挑战。因此，当审计影视企业，特别是处于对赌协议压力下的企业时，审计人员需要采用区别于常规审计的方法，结合舞弊审计和风险导向的审计理念，制定更为有效的审计策略。这包括运用综合分析和具体细节的审计测试等手段，从而有效降低审计工作失败的风险。

应关注行业特性、对赌协议的具体内容、公司的融资及收入来源、股价与绩优财报的背离程度，以及营收与业绩承诺的拟合程度等关键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产生影响，从而增加审计风险。此外，注册会计师还需关注资产的完整性以及应收账款的回款风险。影视传媒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其资产构成和应收账款管理具有独特性，这些方面的潜在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加强对这些方面的审计和核查，以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对赌协议背景下，影视企业存在明显的财务舞弊动机和机会，这要求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展现出更高的警觉性，采用更加灵活和深入的审计方法，以应对财务舞弊带来的挑战，确保审计质量和审计结果的准确性。

6.2 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综合文献回顾与案例分析，探讨了影视公司在完成并购业绩承诺情境下的审计实践和注册会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特别是通过对北京文化审计案例的深入分析，本研究识别了审计过程中需注意的关键风险，并针对这些风险提出了有效的管理措施。

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首先，通过跨行业的比较分析，探讨影视行业与其他行业在面对并购业绩承诺时的审计风险的差异性，旨在理解行业特性如何影响审计风险的产生及其管理。进一步深化对影视企业在并购业绩承诺环境下如何构建和完善内控系统的研究，以减轻审计风险，提升财务报表的质量和透明度。

此外，研究如何设计合理的并购业绩承诺协议，平衡融资方和投资方的利益，同时减少潜在的审计风险，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对并购业绩承诺下审计风险的洞察，进一步提出对现行监管政策和审计准则的改进建议，以更有效地应对这种特殊情境下的审计挑战。

通过上述研究方向的深入探索，未来研究将能够加深对并购业绩承诺下影视企业审计风险的理解，为影视企业的风险管控、审计实践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参考文献

- [1] Aharony J, Swary I. Quarterly Dividend and Earnings Announcements and Stockholders' Returns: An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Finance*, 1980, 35(1): 1-12.
- [2] Ana M Z, Elena H, Alexandra N. Methods for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in Financial Auditing [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 32(2): 595-602.
- [3] Cadman Brian, Carrizose Richard, Faurel Lucile. Economic Determinants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ffects of Earnings: New Insights from SFAS 141[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52(1): 37-74.
- [4] Davis M, Etheridge A. Louis Bachelier's Theory of Speculation[D]. Imperial College, 2006.
- [5] Dionne G, Mélissa L H, Anne B. Doe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ffect the premium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5, 48 (3): 819-852.
- [6] Dong M, Hirshleifer D, Richardson S, Siew Hong Teoh. Does Investor Misvaluation Drive the Takeover Market[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2): 725-762.
- [7] Fuerherm E. Three essays on factors impacting audit quality[D]. University of Kansas. Business: 2015.
- [8] Golden J, Sun L, Zhang J 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oodwill Impairment[J]. *Account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2018, 18 (1): 1-28.
- [9] Haynes J. Risk as an Economic Factor[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895, 9(4): 409-449.
- [10] Hecht C J. Earnings[J].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1967, 2: 2-12.
- [11] Hirshleifer D, Dong M. Does Investor Misvaluation Drive the Takeover Market[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1[2]: 725-762.
- [12] John H C, Ninon K, James A.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M]. 2000: 216.
- [13] Joseph J, Schultz, James L, Loyd B. Integrating Business Risk into Auditor Judgment about the Risk of Material Misstatement: The Influence of a Strategic-Systems Audit Approach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009, 35(2): 238-251.
- [14] Kinney W R, Warren C S. The Decision-Theory Approach to Audit Sampling: An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to Receivables Confirm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Research,1979,17(1):275-285.
- [15]Krishnan J. Litigation risk and auditor resignation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7;72(4):539-560.
- [16]Leonidas Barbopoulos,Sudi Sudarsanam. Determinants of earnout as acquisition payment currency and bidder's value gain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2,36(3):678-694.
- [17]Matthew D. Cain,David J. Denis,Diane K. Denis. Earnouts: A study of financial contracting in acquisition agree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0, 51(1):151-170.
- [18]Muhammad N A.Audit risk model as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1(7):509-522.
- [19]implementation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2011,vol.7:509-522.
- [20]Myers S C,Majluf N 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Journal of Financial, 1984(6):187-221.
- [21]Norman J L,Philip L D.Montgomery's auditing[M]. New York Ronald Press.1957.
- [22]Owhoso V E , Messier W F , Lynch J G. Error Detection by Industry-Specialized Teams during Sequential Audit Review[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2, 40(3):883-900.
- [23]Patricia McConnell.Revenue recognition: finally, a Standard approach for all[J].Investor Perspectives,2014(6):7-12.
- [24]Seidel T.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 Audit Risk Model at the Account Level.University of Arkansas.Accounting.2014.
- [25]Shaik Mohammad Shameer.Media Economics Study Prominence and Relevance in India[J].Social Networking,2015(4):112-118.
- [26]Suweiba Sulemana,Haibo Chen.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Venture Capital Instruments and Control Mechanisms on Growth of Venture Capital Fu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hana[J]. Ope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9,7(1):1368-1386.
- [27]Trigeorgis L. Real options: Managerial flexibility and strategy in resource allocation[M]. Cambridge and London MIT Press, 1996.

- [28]陈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防范与控制[J].时代经贸,2018,(36):67-68.
- [29]陈瑶,杨小娟.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研究.财会通讯,2016(18):42-46
- [30]程锋.高风险激励下的对赌协议及应用[J].财会通讯(理财版),2007(04):14-15.
- [31]邓平.上市公司定增重组业绩对赌的不公平性及完善[J].财务与会计,2017(10):36-38.
- [32]邓秋玲.企业并购重组中业绩承诺的风险识别与应对[J].西部财会,2016(7):52-54.
- [33]高浠媚,陈有禄.我国影视上市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财务风险研究[J].当代传播,2015(02):59-69.
- [34]关静怡,刘娥平.业绩承诺增长率、并购溢价与股价崩盘风险.证券市场导报,2019(02):35-44.
- [35]韩维芳.审计风险、审计师个人的经验与审计质量[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32(03):35-45.
- [36]胡春元.风险基础审计[J].审计研究,1996(05):7-16.
- [37]黄晓波,晏妮.基于财务业绩的对赌协议及其应用——永乐电器与摩根士丹利对赌协议案例分析[J].财会通讯,2011(25):11-12.
- [38]李雅杰.浅谈对赌协议[J].纳税,2017(15):126.
- [39]吕长江,韩慧博.业绩补偿承诺协同效应与并购收益分配[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56-59.
- [40]孔德泰,杨子铭.文化创新产业中风险审计应用研究[J].财会通讯,2017[10]:34-38.
- [41]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J].审计研究,2006(02):74-80.
- [42]刘蓉.数据式审计模式下审计风险的研究[J].会计之友,2016(19):119-122.
- [43]刘微芳,苏三妹.内部控制、诉讼风险与债务成本——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福州大学学报,2018,(5):49-56.
- [44]柳建华,徐婷婷,陆军.并购业绩补偿承诺会诱导盈余管理吗?[J].管理科学学报,2021(10):82-105.
- [45]孟方琳,田增瑞,赵袁军.创业投资运用对赌协议的机理、效果及策略研究[J].南方金融,2018(07):49-57.
- [46]米咏梅.企业融资中的对赌协议:激励与风险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6):118-120.
- [47]潘爱玲,邱金龙.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实证检验[J].会计研究,2017(3):34-42.

- [48]秦荣生.审计风险探源信息不对称[J].审计研究,2005(05):6-10.
- [49]任俊帆.货币政策公告、信号传递与股市公告溢价效应——来自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4(2):48-66.
- [50]孙乃中.审计失败与若干相关概念关系探讨[J].商业会计,2017(14):17-20.
- [51]汤谷良,刘辉.机构投资者“对赌协议”的治理效应与财务启示[J].财务与会计,2006(20):33-36.
- [52]涂君.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风险与风险管理的研究[J].财会研究,2016,(11):62-64.
- [53]王灿.浅谈影视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市场,2019(09):93-95.
- [54]王广明,沈辉.试论供给导向的风险基础审计[J].会计研究,2001(12):51-54.
- [55]王生年,宋媛媛,徐亚飞.审计师行业专长缓解了资产误定价吗[J].审计研究,2018,(2):96-103.
- [56]王会金.重要性与审计风险[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13-14.
- [57]王丽平.论并购重组的业绩承诺与盈余管理[J].现代营销,2019(06):160-161.
- [58]许年行,张华,吴世农.附加承诺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吗[J].管理世界,2008(03):142-151.
- [59]饶斌,周晓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对赌协议规划及风险控制[J].江西社会科学,2020,(03):211-220.
- [60]朱欣民,梅裔.风险创业中的对赌机制及其风险识别——基于创业者保护的视角[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6):185-197.
- [61]翟进步,窦超.业绩承诺背后的财富转移效应研究[J].金融研究,2020(12):23-25.
- [62]张波,黄培清.对赌协议的经济学研究[J].上海管理科学,2009(01):6-10.
- [63]张楚堂.论审计风险的概念.审计研究,2001(02):48-50.
- [64]张黎焱.电影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研究[J].当代电影,2019(06):82-88.
- [65]张鹏.业绩承诺、机会主义与企业金融化[J].经济学动态,2021(12):90-109.
- [66]张萍,郎方方.审计风险模型在金融业中的应用研究——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J].财会研究,2018,(8):58-64.
- [67]郑军,王瑛.影视制作企业内部控制研究[J].财政监督,2011(11):48-50.
- [68]周勤业,龙家荣,达士华.审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12-14.

后 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的硕士研究生求学即将结束。回想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心中泛起无限感激。在研究学习和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无数人的帮助和支持。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张金辉导师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给予我的培养与教诲。您在专业学习研究方法论文撰写和职业发展上提供了宝贵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张金辉教授无论是在工作与职业发展还是学术与专业知识都有很深厚的功底，多方位培养我们的专业能力。

感谢研究生三年的学习生涯中，课程老师们的无私传授和学校工作者的辛勤奉献。你们的工作为我们扎实的学术发展提供筑基扎根的肥沃土壤。兰州财经大学在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方面，采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与最前沿的教学模式对我们全方位培养。在校期间正逢疫情肆虐，学校中的行政老师都与同学们共同应对，感谢疫情期间行政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此外，我也要参与讨论和提供建议同学和朋友表示感谢。同学们在学业的交流与讨论让我的知识结构研究逻辑更加丰富多元，你们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困难时刻保持动力。我的同学室友无论在课程研究还是生活方面都给予我太多帮助，没有你们，我很难坚定意志完成我的研究生阶段。

最后，我要感谢我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祖父祖母对我的悉心照顾、叔叔婶婶的学术指导以及未婚妻对我的陪伴与信任。你们的理解、耐心和无私的支持是我完成这项学术旅程的坚强后盾。